



长夜惊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长 夜 惊 雷

(上海轻工业工人解放前斗争史片断)

上海 人 民 出 版 社

长 夜 惊 雷

上海市轻工业局厂史编写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25 字数 87,000

1975年4月第1版 197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统一书号: 11171·118 定价: 0.24元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毛主席语录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但是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

编者的话

这里，记载的是上海轻工业工人解放前斗争史中的一些片断。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中国原料多、市场大的特点，开设大量轻工业工厂，重利盘剥中国人民。在所谓“利华”等骗人的招牌后面，帝国主义勾结中国的反动政府和官僚资本家，对中国工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压榨和蹂躏。怡和洋行、海宁生洋行、沙利文面包厂等的洋老板的剥削史，都是一部部血腥的罪恶史。他们把中国工人的血汗，化为美金、英镑……，把中国工人的白骨，垒成了“冒险家的乐园”！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几十年来，上海轻工业工人，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采取各种形式，同帝国主义、反动政府和反动的资本家，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他们的斗争，犹如浦江之水，奔腾澎湃，从不停息。在漫漫的长夜中，响起了一阵阵惊雷。

这本书的内容，就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反映上海轻工业工人，为配合我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掀起一个个的波澜壮阔的罢工运动，狠狠地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解放以后，特别是在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上海轻工业工人遵循毛主席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他们深深懂得：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万里征途放眼望，五洲风雷心中装，胸怀全球，干劲倍增。他们决心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学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为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的厂史编写组的成员，大多是来自机器旁的工人。在局党委的领导和关怀下，在各厂工人同志的亲切鼓励和支持下，我们拿起了笔，满怀革命的激情为工人阶级编撰历史，为无产阶级谱写颂歌。但是，由于我们的政治水平和写作水平有限，在编写工作中一定还存在缺点和错误。我们殷切地期待着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上海市轻工业局厂史编写组

目 录

怒烧“哈德门”	1
警署夺枪	12
怡和啤酒厂亏损的秘密	25
面包工人痛打洋鬼子	35
愤怒的家庭女工	42
“三星蚊香”老板“抵制日货”真相	50
纸厂烈火	56
拒造“鬼子车”	65
帝国主义的“害华公司”	73
包围“老晋隆”	83
冷饮厂的惊雷	90
抽逃资金阴谋的破产	102
罢印伪钞的斗争	110
只有拿起枪	119

怒烧“哈德门”

香烟，是大家所熟悉的东西。可是在旧中国就连这种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东西，也被帝国主义垄断。现在的上海卷烟厂，前身就是英、美帝国主义合办的“英美烟草公司”所属的英美烟厂。那时生产的并不是“中华”牌、“光荣”牌等香烟，而是一连串外国名字的“洋烟”。如“哈德门”、“茄力克”、“大英”牌等等。因此，一提起这些“洋烟”，上海卷烟厂的老工人总忘不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罪恶历史，同时，也忘不了烟草工人怒烧“哈德门”的英勇斗争。

“哈德门”的来历

中国原来没有香烟。鸦片战争以后，英、美等帝国主义依靠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继而又取得了种种特权，在中国开起厂来，大规模地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当时帝国主义在上海开设的英美烟厂就是一例。

英美烟厂生产的有一种“哈德门”牌香烟。“哈德”，是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华时的一个英军头目的名字，当时，由他带领的侵略军攻入北京城的崇文门。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由于侵华“功劳”，帝国主义就将崇文门改为“哈德门”，并把它作为香烟的一个牌号。妄图向中国人炫耀他们的血腥罪

行,进一步灌输奴化思想。

那么,英、美帝国主义是如何在中国侵略掠夺,开厂剥削的呢?

当英、美帝国主义刚踏进中国领土的时候,就想把香烟卖给中国人,从中牟取暴利,可是谁也不睬他们,于是,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奉送”。过了一些时候,当他们看到中国人已经对香烟感兴趣了,就开始大量倾销。到一九〇二年,英国帝国烟草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就合伙开办了“英美烟草公司”(总公司在伦敦),并直接在上海浦东陆家嘴开起厂来,这就是英美烟厂的老厂。

英美烟厂的资本家还利用中国一些地痞流氓分头到山东益都、河南许昌、安徽凤阳等烟叶产区,搜刮和掠夺原料,他们和当地官厅、地主勾结在一起,设立烟叶收购站,直接和农民接触。起初,英美烟厂的资本家以赠送种子,并“保证”以现金高价收购为饵,诱骗当地农民将粮田改种烟叶。但等到烟区扩大,产量增加,英美烟厂的资本家就不断地降低收购价格,迫使农民廉价出售。在收购期间,农民还要受种种折磨和额外剥削。如在许昌,烟农必须到资本家指定的远在一、二百里路以外的地点去等候收购。在评价时,英美烟厂的资本家又故意挑剔,压低等级。明明质量很好的烟叶可卖头等的,只给你评上个二等甚至三等,烟农不肯卖,资本家把蓝眼珠一瞪,叫来官厅保驾,公差说:“谁不照契约办事(事先洋鬼子先付了定洋和烟农签订了契约)就带到衙门问罪!”烟农借了高利贷,付出比种小麦、大豆高出几倍的成本,起早摸黑,一年的血汗,就这样被英美烟厂的资本家明买暗抢去了。烟农受了欺骗,生活更困苦,于是英美烟厂的资本家用贷款来进一步欺骗烟

农。这样，烟农们年年月月受盘剥，生活真比烟叶还要苦三分，而这些外国资本家垄断了卷烟原料，腰包却越填越大。

英美资本家由于有本国政府做“靠山”，中国反动政权做“支柱”，买办资产阶级当“领港”，他们的掠夺手段越来越狠，剥削黑心也越来越大。一九一七年，他们就在老厂附近开设新厂，大兴土木，建造厂房和添置机器，工人增加到六千多人。一九二五年，又在上海通北路增开了英美烟厂三厂。到一九四一年时，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各地，共有分公司和办事处二十八处，在上海、汉口、天津等地有工厂十一个。此外还拥有制造、运销、原料、印刷、包装、信托等十一个附属公司。几乎垄断了当时上海和中国各地的卷烟市场。

据统计，英美烟厂老板在中国头四十年的侵略剥削中所掠夺的利润，约合几亿美元。仅这个数字，就已相当于它在中国最初投资的三千多倍。英美烟草公司首任董事长，英国“烟草大王”杜克死去时，遗有财产一亿美元之巨，这些钱，都是从中国广大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哈德门”，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残酷剥削中国工人的血泪斑斑的罪证。

“哈德门”是地狱门

“哈德门”是英美资本家的发财门，却是中国烟草工人的地狱门。

英美烟厂资本家根本不把工人当人看待。首先是劳动环境十分恶劣。窗子全部用铁丝扎起来，整个车间象个大蒸笼，又闷热又潮湿。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人成年累月地繁重劳动，昏倒在机器旁是常见的现象，飞速旋转的皮带盘没有一个防

护罩，事故经常发生。狠毒的资本家对遭受工伤的工人根本不给医治。

英美烟厂资本家还规定了多如牛毛的厂规，限制工人的行动自由。光是不准讲话，不准随便走动，不准吃东西，不准东张西望等等规定，就有七十条之多。这些名目繁多的“厂规”，是套在工人头上的枷锁，把工人压得透不过气来。

当时，工人一天要干十三、四小时的活，中午放工时，许多工人来不及回家吃饭，又没有钱到厂外去买饭，只得带点冷饭来充饥。可是，洋老板和工头管得很紧，不许工人在车间里吃东西，要是查出来，就会以“违反厂规”为名，立刻给你处罚。一天中午，女工阿珠在车间里吃饭，被工头看见了。狼心狗肺的工头抢过饭碗，捞了一把烟丝塞在里面，蛮横地逼着阿珠吃下去，阿珠坚决反抗。工头一把抓住阿珠的头发大声叫了起来：“吃下去，不吃马上开除！”这时旁边的工人越聚越多，这个工头看到工人们个个眼睛里喷着怒火，才没敢强迫下去。后来，阿珠还是被扣了半天工钱。工人不但吃饭没有自由，就连大小便也要受到无理的限制。工人大小便要领牌子，没有牌子不能随便上厕所，否则被工头看见就要拳打脚踢，甚至开除出厂。

在英美烟厂这个大地狱里，童工和女工更是被压在最底层。资本家为了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招收了大批童工。据统计，在开厂初期，招收童工的人数占全厂的三分之一左右。收进的童工中大都是一些十二、三岁的孩子，最小的甚至只有九岁、十岁。而他们却要牛马般地干成年人的活。成年工的工资已经很低，而童工的工资只能拿成年工的一半。工头对童工任意虐待，稍不称心就是一顿皮鞭，或者罚他们双

手捧着几十条香烟，跪上三、四个钟头。在洋老板统治下的童工，整天拚死拚活给资本家卖命，换来的只是一日两餐照得见人影的稀粥汤。再加上睡眠不足，不少孩子都被折磨得面黄肌瘦，皮包骨头。

在这个大地狱里，工人不仅受着种种折磨，而且还有随时被解雇的危险。英美烟厂的洋老板经常到车间巡视，看到四十岁上下的工人，就认为没有劳动力可剥削了，就收去工牌，踢出厂门，这叫“踢老人”。有一个叫贵全妈妈的工人，在厂里做了二十多年工，年老体弱，被洋老板一脚踢出，沦为乞丐，不久饿死在厂门口。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二日，英美烟草公司在浦东老厂门口突然钉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老厂关闭，永久不开”。一次就开除了三千多工人。原来，洋老板因为老厂的机器设备和厂房都比较陈旧，嫌生产效率低；厂离码头又远，运输不方便，成本也高。洋老板为了更多地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就关掉老厂，在其他地方另开新厂。至于工人们失业后的生活，贪得无厌的洋老板是根本不管的。被开除的工人聚集在厂门口，都气愤地说：“总有一天要烧掉这人间地狱！”……

怒烧“哈德门”

英美烟厂资本家的残酷压榨，必然引起工人强烈反抗。据不完全统计，自一九〇六年浦东烟厂工人第一次罢工算起，到上海解放前夕，英美烟草公司上海各厂的工人大大小小罢工斗争，先后共达一百二十七次之多。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工人阶级反对帝国

主义的斗争有了进一步发展，烟厂的工人运动也迅速地发展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办起了夜校，成立了工会，工人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一批批优秀工人参加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工人们有了自己的组织，对洋老板的斗争更是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日本强盗杀害了上海“内外棉”纱厂工人顾正红。五月三十日，英国强盗又在南京路开枪屠杀游行示威的工人和学生。血淋淋的惨案，激起了全上海人民极大的愤怒。中国共产党号召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跟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上海总工会就在这时成立。在六月一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告全体工友书》：

“我们的身体好象牛马一样，
我们的性命好象虫蚁一样，
报仇雪耻，反抗残暴杀人的外国强盗！
工友们！起来呀！罢工呀！”

在党的号召下，全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长期埋藏在人民心底的怒火，炽热地燃烧起来，自六月一日至六月十七日半个月中，上海就有二十五万人参加了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行列。

英美烟厂工人和全市工人一起，热烈响应党的号召，掀起了“五卅”反帝斗争的风暴。罢工首先由浦西英美三厂开始，然后扩展到浦东新、老两厂。六月四日，工会在三厂组织了一支十多人的宣传队，分成两组，渡过黄浦江，到新、老两厂联络罢工。去老厂的那一组由纠察队长潘金荣率领他们依照事先商量好的计划，一到厂门口就站得高高地宣传起来。几个女工飞也似地奔向各车间大声喊着：“大家关车啦，到厂门口去

听三厂兄弟演讲啊！”“三厂已经罢工了，我们也不要再做了！”听到女工们一喊，大家立即关掉了机器，向外冲去。一路上不断地高喊：“兄弟姐妹们，大家快出去听演讲啊！”霎时，各车间的机器全部停了下来。包香烟的商标纸，空壳子，顿时在车间里飞舞，地上抛满了成堆的香烟。

一个工头贼头狗脑地跑到厂外张了一眼，急忙奔到写字间报告洋大班。洋大班害怕工人听了演讲会闹罢工，急忙带了一批工贼走狗，跌跌撞撞地赶到厂门口，把两扇大门关了起来。他一眼瞥见工人们正从车间里涌出来，便象疯狗一样对大家嚷道：“统统不许出去，哪个出去就开除他！”几个走狗也趁势在一旁叫嚷：“识相点，还是进去做生活，谁听演讲就叫谁去吃官司！”工人们见洋大班关了厂门，厉声责问洋大班：

“为什么关起大门？”

“为什么不让我们听演讲？”

“外国人没有资格干涉中国工人的事！”

这时，新厂的工人冲破洋大班和工头的阻挠，在宣传队的带领下，正向老厂这边涌来。他们见老厂的两扇门关得死紧，工人们被拦在里面，就拾起路旁的石块、砖头，雨点似地向铁门砸去，齐声高喊：“老厂兄弟们，快点出来呀！我们已经罢工了！大家拿出勇气，快点冲出来！”老厂的工人听到外面在叫喊，知道新厂工人已经行动起来，就不顾一切冲出厂门。于是新老两厂八千多工人汇合在一起。

厂门外面宣传队队员们高高地站在凳子上，向大家讲述“五卅”惨案的经过。悲愤激昂的演讲，点燃了工人胸中的怒火，人人振臂高呼：

“替顾正红报仇！”

“打倒帝国主义！”

“中国工人团结起来！”

“收回租界！”

忽然，远处跑来几个工人对大家说：

“日华纱厂的洋鬼子、走狗，阻止工人罢工，工人们正与他们搏斗……”

“到日华纱厂去！到日华纱厂去！”工人们喊着。

大家潮水般地涌往附近的日华纱厂。日华纱厂工人见大队人马前来支援，与鬼子斗争更加奋勇。纱厂的日本大班惊惶失措，急忙打电话给三区警署，要求派武力镇压。

大家正要上街游行，突然被全副武装的反动警察迎面拦住。警察不问情由将跑在队伍前面的四个工人抓了就走。大家冲上去怒吼着：“你们讲理不讲理？罢工是我们工人的事情，你们为什么要干涉？你们为什么要抓人？要去大家一道去！”“对，要去大家一道去！”几千个工人一齐向警察冲过去，警察见势不妙，放下四个工人，拔脚就逃。

在党领导下的五卅运动中，英美烟厂的工人坚持了四个月的反帝大罢工，并且，同全国工人阶级一起参加了抵制英货、日货的斗争。罢工的第八天，全市工人参加了市民大会。在这个十万多人的群众大会上，一致通过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项交涉条件，要帝国主义者惩凶、赔偿、道歉、撤退驻华军队，取消领事裁判权，中国人在租界内有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工人有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等等。大会又决定，从这天起和帝国主义实行经济绝交，抵制英货、日货，以迫使帝国主义接受条件。

烟厂工人根据大会决定，立刻投入了抵制英货、日货的运

动。男工们组织了三个行动大队，女工们也组织了宣传队。他们写标语、印传单、拆掉英美烟草公司的广告牌子，劝阻商人不经销，市民不吸英美烟草公司的香烟，并写信通知报馆停止刊登英美烟草公司的广告。工人们兴奋地说：“这次要洋老板看看我们中国工人的厉害。”工人组成的宣传队走遍了大街小巷，他们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人们都主动地将袋里的“哈德门”等各种牌子的“洋烟”，拿出来交给宣传队，表示反帝的决心。行动的第二天，工人就拆除了几十块广告牌，收集到大量英美烟草公司的各种香烟。盛行一时的“哈德门”等香烟再也没人问津。《申报》上原来刊登英美烟草公司广告的地方，也开了“天窗”。

洋老板一看形势不妙，便把蓝眼珠一转，狞笑着又使出了“奉送”的老把戏，企图破坏工人抵制英货、日货的运动。他们叫来了一批走狗，在马路、人堆里到处乱扔“哈德门”等香烟。他们恶毒地盘算着，只要有人拾起这些香烟，就证明“哈德门”等香烟在中国还有市场，英美烟厂还能在上海立得住脚。等工潮平静下去，就不愁捞不回损失。

洋老板的这个如意算盘很快就落空了。工人们一发现这种情况，马上采取措施。纠察队长潘金荣带了几十个队员，分头把正在扔烟的家伙围了起来。纠察队关押了几个为首的顽固分子。其余的家伙见到工人的这种声势吓得再也不敢为洋老板扔烟了。

洋老板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准备把香烟悄悄地运到别处去贩卖。但是如何运走呢？走铁路，铁路工人早已罢工；走水路，码头工人也举行了示威游行，拒装拒卸英、日货物。商量结果，决定雇两艘白俄的驳船，趁工人不备溜出

上海。

这天，工人宣传队正在街上宣传，忽然传来消息，黄浦江边发现两艘驳船，上面装的全是“哈德门”香烟，这消息激怒了工人们。

“他们偷运香烟，就是不接受我们提出的条件！”

“我们要叫他们看看中国工人的厉害！”

“把‘哈德门’截回来烧掉！”

“对，烧！”

潘金荣等几十名纠察队员飞快地奔向黄浦江边。这时船已行至江心。几十名纠察队员对着驳船高喊：“外国强盗杀死了我们中国工人，打死了许多学生，我们要报仇雪耻，大家不要给外国人做工，快摇回来呀！”

船上的两名中国工人，听到岸边工人的高喊，不顾外国监工的威胁，迅速掉转船头，箭一样地朝岸边靠拢。岸边的纠察队员，还没等船靠岸，已经鱼贯跃入船舱。一瞬间，船上的香烟统统被搬到了春江码头的空地上。几百箱“哈德门”和以前收集的香烟堆得象小山一样高。大家拿了火油，抱着稻草，向码头边奔边喊：“大家快去看火烧‘哈德门’香烟！”“火烧‘哈德门’香烟啦！”

成千上万的市民，听到工人要烧掉洋老板的香烟，也跟着工人们来到码头。工人们把火油浇在烟箱上，点燃了稻草，那堆得象小山一样高的香烟，立即烧了起来。空场上烟雾弥漫，几百箱“哈德门”香烟，一转眼化为灰烬。人们拍手称快。

“烧得好！烧得好！烧死他个外国佬！”

烟厂工人怒烧“哈德门”，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无比巨大的力量，给了帝国主义分子一次狠狠打击。



警 署 夺 枪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鼓舞下，富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推翻黑暗的封建军阀统治，配合北伐战争，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第三次武装起义。

这一天，全市风起云涌，很快地组成了有八十万人民群众参加的“三罢”（罢工、罢课、罢市）大军。它象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冲击着濒临灭亡的军阀统治。数千名起义的先锋——工人武装纠察队，在统一的预定时间里，分别向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闸北七个区的大小军阀据点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在闸北，北洋军阀的兵力较为集中。北火车站、东方图书馆、湖州会馆等地方，都盘踞着相当数量的军队，这对参加包围和进攻这些据点的闸北工人纠察队来说，任务是很艰巨的。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纠察队，也同样肩负了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战斗刚打响，他们就分兵数路，首先包围了商务印书馆对面东方图书馆的敌军。东方图书馆里，驻扎着不久前从北方调来上海，妄图为北伐军手下败将孙传芳撑腰打气的直鲁军。这些老爷兵，自恃兵多弹足，仗着钢筋楼房建筑，拚命顽抗。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由于武器少，子弹不足，进攻的火力不太强，一时难以攻下。

领导这支工人武装队伍的商务印书馆党组织，根据这种战斗形势，准备立即派出一支纠察队，袭击防备较弱的五区警署，夺取警察的武器，武装工人队伍，支援攻打东方图书馆的战斗，彻底歼灭北洋军阀的残余力量。

经讨论，党组织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再三请战的纠察队分队长徐文思同志。

徐文思同志是商务印书馆的石印工人，曾参加过前两次武装起义和多次罢工斗争。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使他沉着，老练。这次起义，他担任了纠察分队长兼总交通队队长。这天，战斗一开始，他没能直接上火线，急得直搓手，象失去了什么最宝贵的东西似的。当他正想再次请战的时候，交通员跑来告诉他：要他上指挥部接受任务去。他领导的分队都是一些二十来岁的青年，他们奉令集结在医疗室前，听候调遣。现在看到队长走了，心想：一定是去领取武器，准备干了，嘿，真带劲！他们的心情和队长一样，由于其他几个兄弟分队都接连不断地去执行任务了，唯独他们按兵不动，所以没有一个人心里不焦急的。眼下北伐军已到上海附近，黑暗的军阀统治就要垮台，能这样坐等胜利吗？不！不能！那些贪得无厌的外国强盗，那些祸国殃民的反动军阀，非要亲手把它们统统打倒不可！大家听着外面一阵阵激烈的枪炮声，议论纷纷，跃跃欲试。

不多时，徐文思回来了，大家高兴地蜂拥而上，把他团团围住。一个最年轻的小伙子忙问：“徐大哥，枪领到啦？”徐文思把手中的匣子枪和手榴弹朝大家扬了扬说：“看！就是这几个铁家伙！”大家一看，这么多的人，怎么只有一支枪和两颗手榴弹。徐文思理解大家对武器渴望已久的迫切心情。早在

起义前，就有很多同志参加秘密运枪，他们为了使武器能安全地从南市运到厂里，不怕绕远道，不怕危险，与敌人周旋斗智，出色完成任务。今天，战斗已经打响，工人是多么需要拿着枪去冲锋陷阵呀！徐文思看大家不响，笑了笑说：“工友们，大家是不是嫌枪少啊！怎么办呢？去夺！敌人手中有的是枪嘛！我们要武器只有从敌人的手中夺！现在上级就把夺枪的任务交给了我们。”

一听队长说向敌人夺枪，大家心头顿时一亮，“我去！”“我去！”工人们争个不休，抢着要去。徐文思提高了嗓门说：“大家不要争，都去，保险一人有一支就是了。”接着，他把党的指示详详细细向大家进行了传达。武器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掌握武器的人。还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只要路线正确，没有枪也会有枪。只有明确为谁打仗，才能取胜。最后，徐文思把手中的匣子枪用力挥了挥说：“我们的行动口号是：攻下五区警署，消灭北洋军阀！”

五区警察署是商务工人的老对手，老冤家了。它是军阀李宝章设置在闸北的一个黑据点。警察署长杨小亭，工人都叫他“地头蛇”，是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署里的“黑狗”，都是些地痞流氓，恶棍歹徒，一贯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在商务印书馆的几次罢工斗争中，这些强盗对工人兄弟进行了残酷镇压，但都遭到了工人们的英勇还击。第二次武装起义时，“地头蛇”因为尝过商务工人的铁拳滋味，怕赤膊上阵再落个损兵折将的下场，便狡猾地让警察署的密探和伪巡长出面，带着大批军队冲进厂里，抓走了十几个工人纠察队员。这一桩桩刻骨的阶级仇恨，就象火团一样积聚在工人们心头，越烧越旺。大家早就想一举拔掉这个贯于镇压工人运动的桥头堡

了。现在听了徐队长把任务一摆，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一拳将它砸个粉碎！把一支支枪夺到自己的手里，向帝国主义强盗和反动军阀猛烈开火！

徐文思看到大家情绪振奋，斗志旺盛，心情十分激动。他要求大家发扬过去罢工斗争的传统，拿起木棒、铁棍当武器，打击敌人。不一时，几十个工人纠察队员都武装起来了。有的还把消防用的太平斧也扛上了肩，还有的把平时练武用的三节棍、九节鞭都拿了出来，有几个年纪小的学徒，见这些东西都被拿光了，便拿着几根扎书用的绳子笑着说：“用它牵‘黑狗’可灵啦！”

“武器”已准备就绪，徐文思把手一挥说：“跟我来！”队员们精神抖擞，浩浩荡荡地杀向五区警察署！

五区警察署位于宝山路天吉里，和商务印书馆相距不远，都在同一条马路上。战斗打响前，商务工人纠察队的少数队员，早就把警署秘密监视起来了，而伪警署的头目“地头蛇”，却还蒙在鼓里呢。虽然他事先也从工贼嘴里得到一点风声，但不相信这场暴风骤雨会来得如此迅猛。一清早，署内密探倾巢而出，指望能得到些可靠消息。但是，他们一出门却被工人纠察队一一监视了起来。就是五区警署安插在商务印书馆里的所谓稽查员，也不例外。那些“地头蛇”所豢养的走狗，出了警署后，就是长了翅膀也无法飞回他们的老窝。没有这些败类提供情报，“地头蛇”就成“瞎眼蛇”了。

半天的时间过去了。这个老奸巨滑的“地头蛇”，一则不见密探归窝，二来听到了东方图书馆、北站、湖州会馆一带的枪声，便觉得情况不妙。他非常害怕工人斗争的烈火烧到自己身上来，忙命令“黑狗”们紧闭大门，加强警戒。

正当五区警察署内“地头蛇”和“黑狗”们惴惴不安的时候，徐文思已经带着工人纠察队，来到了这个杀人的魔窟附近。预先埋伏在这里的纠察队员，向徐文思报告了警察署的情况，徐文思迅速地察看了一下地形。阴森森的警署石库门房子，窗口上伸出了一支支枪，房子里黑影幢幢，看来敌人有了准备。徐文思立即吩咐队员们停止前进。这时，警察署里的“地头蛇”也发现了工人纠察队，便指挥着“黑狗”们向工人疯狂射击，企图用枪弹阻止工人的前进。子弹“嘘嘘”地从头上飞过，击在纠察队周围的石板上象雨点一样，有几个队员因为缺少战斗经验，不幸被流弹击伤。徐文思怒火万丈，将胸前衣襟朝两边一拉，把袖管往上一捋，举起匣子枪，拿出不久前在党举办的军事训练班练得的架式，迅速地朝前瞄了瞄，从容地勾动扳机，“叭”的一枪，警察署里一个“黑狗”应声倒了下去，顿时警署里枪声嘎然而止。

趁此机会，徐文思指挥纠察队的工友们挥舞着长矛、大刀、短棍、铁棒冲了上去。有个队员提着一把大锤，一马当先冲到警察署大门口，挥起大锤对准大门就砸。眼看大门要被砸开，后面的队员也冲了上来，“地头蛇”和黑狗才从恐慌中惊醒过来，又开始向工人射击。一发子弹打中了砸门的队员，他身体晃了几下，栽倒在地。后面的队员见此都想上去抢救，可是敌人的火力压了过来。队员们一个个睁圆了眼睛，心如火燎地望着队长。徐队长理解大家的心情，眼看着战友受伤，真想和大家来一个冲锋，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压下去，可是，敌我力量悬殊太大！不能硬拚！他咬紧牙关，作了个撤走的手势，队员们陆续地撤了下去。突然有个小伙子，大叫一声“师傅”，竟冒着危险一个劲儿想往前闯，徐文思一见，也来不及细想，

跃起身来，用力将他按在地上。“啪啪”一阵子弹打来，身前身后，弹花四溅。徐文思猛地感到左臂一阵麻木，但他毫不在意，双眼怒视着警署，又回敬了“黑狗”一发子弹，然后对这位小伙子说：“先撤到一边去！”这个小伙子见“黑狗”竟如此猖狂，打伤了他的师傅，正想冲上去，拚个你死我活，一听队长叫撤，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徐文思见他有些犹豫，又催促了一声，他才打了一个滚，翻身爬起，紧靠着墙根，退了下去。最后徐文思纵身飞步冲到门前，揹起受伤的那个工友往下撤，这时他感到每爬一下，左臂就有一阵钻心的疼痛，这才意识到自己负伤了。

已经撤下来的队员，见队长揹着伤员在弹雨下匍匐着向前，都为他捏把汗。“快！快！”他们是为队长的安全担心，但不知队长已负伤，每行动一步，都需付出很大力量。徐文思冒着敌人的弹雨气喘吁吁，额上冒着汗珠，好不容易撤了下来。队员们忙从队长身上接过伤员。大家的目光一下集中注视着队长，只见他左臂上殷红的鲜血直往外冒。徐文思微微地笑了笑说：“没啥，不过弹掉块皮。”边说边从上衣撕了块布，三绕两缠地简单包扎一下，把鲜红的袖标往伤口上移了移，将手臂甩了两下，说：“不碍事了！”队员们看在眼里，感动极了。他们一面替伤员包扎伤口，一面又对队长的伤势表示关切，都想劝他撤离战场，但大家又熟悉这个钢铁汉子的脾气，今天夺枪任务没完成，他决不会离开战场！何况在这个夺枪遇阻的紧张时刻，大家也正等着他拿主意呢！

警署里，“黑狗”的枪声，还在起劲地响着，他们看到工人退去，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只是盲目放枪壮胆，却不敢出来追赶。

这边，徐文思正和大家商量下一步攻打警署的办法。有的说，管它是硬是软，反正与它拚到底，不夺到武器决不罢休！有的说，咱们不能硬拚，得想个法子，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拿下警署，夺取枪弹。大家都觉得这个同志说得对，可是又用啥个好法子呢？忽然一个手拿鞭炮的队员说：“你们看，这些鞭炮不也可以为冲锋派用处吗？”这些鞭炮本来是准备吓吓那些监视工人的“黑狗”。现在给这么一提醒，大家连声说好。队员们又表决心，又出主意，真是人多智慧强。徐文思根据敌情和大家出的点子，感到光凭一股子勇气还不行，勇要勇在刀刃上，与狡猾的“地头蛇”斗，得有勇有谋。于是，当机立断，决定分兵两路，一队从后门主攻，一队在前门佯攻，吸引敌人火力，为后门突破创造条件，做到协同一致，按信号行动。徐文思把打算跟队员们一五一十地讲，大家都信心十足地说：“队长想得周到，听徐大哥的指挥，管它‘黑狗’‘黄狗’，我们来个关门打狗。”

徐文思考虑到正面佯攻危险性大，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应该义不容辞的担当起这个任务来。于是便从身上摘下匣子枪和一枚手榴弹交给一个队员，要他指挥主攻队伍。那个队员曾经和徐文思一起在党的军事训练班里受过训练，徐文思相信他能完成这个任务。那个队员接过队长的枪和手榴弹，满怀信心地拉着队长的手说道：“坚决完成任务！”说完，就和其他队员一起，绕道向警察署后门迂回过去。

徐文思把鞭炮组安排在弄堂里、房顶上。这个组里的五、六个虎头虎脑的青年也向徐队长表决心：“保证闻风而动，密切配合！”徐队长风趣地和他们说：“你们是‘主力’部队，‘机枪’，‘小钢炮’都在你们手里，看你们的威力啦！”他又把其他



队员隐蔽在高墙后、屋顶上，要求他们按预定信号行动，高喊口号，挥动手中的武器，不要擅自冲出来。布置完毕，他就和拿太平斧的青年弓着腰，向警察署大门摸去。

他们以高墙、房屋为屏障，隐蔽在警署周围。徐文思向队员们用手发出了第一个信号，蓦地警署周围同时发出了“冲呀！”“杀呀！”“缴枪不杀！”的怒吼声。这个突然的声响，好比晴天霹雳，震得警察署楼上楼下一阵骚动。“地头蛇”象只受惊的野兽，咆哮着：“开枪！开枪！他妈的怎么还不开枪！”有两个“黑狗”慢了一点，被他狠狠地踢了几靴子。其实他自己也不知朝那里打好！眼前既没有队伍，也没有一个人影。“黑狗”们心慌意乱地抱起枪，毫无目标地打了起来。“地头蛇”更是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

这时候，徐文思和一个拿着太平斧的青年敏捷地避开“黑狗”的枪弹，一会儿弯腰跨步，一会儿侧身跃进，步步紧逼大门。这给警察署里的“地头蛇”看见了，急得他大喊大叫：“朝这边打，这边打！”“黑狗”听到“地头蛇”咋呼，一看不好，几个人影已经出现在大门前不远的地方了，便疯狂地朝下面扫射。徐队长和那个青年一个箭步，机灵地闪进一个拐角，密集的机枪子弹在他们身后扫起一股尘雾。

徐队长一面做手势，一面高喊着：“你们被包围啦，放下枪投降吧！”

敌人最害怕动摇军心，听到喊话，狠狠地朝他们打来一梭子弹。徐文思顾不得这些，只是接连不断地继续喊：“再不投降，死路一条！”话声没落，机枪又叫了起来。“黑狗”们这挺机枪的火舌，恨不得要把徐文思他们一口吞下去。这样一来，警署里的注意力和火力就被徐文思吸引过来了，他每喊一次话，

敌人就打一阵排子枪。敌人中计了，徐文思完全牵住了他们的鼻子。

机不可失，徐文思向纠察队员们发出了第二个信号，信号象闪电一样，传遍了整个阵地。鞭炮组的队员赶紧把单响大炮仗和百响小鞭炮放进预先准备好的油墨桶和火油箱里，一一点燃。霎时，烟雾腾腾，火光四起。“哒哒哒哒”，“嘭嘭嘭！”大大小小的鞭炮发出了连续不断的轰鸣，象无数挺机枪和大炮在怒吼。队员们一面放，一面喊着口号。暴风雨般的爆炸声、口号声，一阵比一阵激烈。这时，从厂里罢工的工友们和从包围东方图书馆抽出来的部分工人纠察队，携带着长枪赶来投入战斗，他们爬上四周楼顶，把“黑狗”击毙。鞭炮声、冲杀声夹杂着枪声，交织在一起，象一阵阵排山倒海的巨浪，警署完全处在人民群众斗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疯狂而又十分虚弱的敌人，面对这工人群众斗争的浩大声势，闻风丧胆。那机枪般的鞭炮爆炸声，吓得他们肝胆俱裂。过分的恐惧，使他们五官失灵，四肢麻木，“黑狗”们暗暗嘀咕着，这个说：“没听见吗，人家都有枪有炮，人山人海，这千军万马能挡得住吗？”那个说：“缴枪投降吧，不然真的死路一条了。”

有几个甚至丢了枪要逃。凶恶的“地头蛇”见乱了阵脚，忙拔出手枪，一连打死了几个“黑狗”，其它“黑狗”在他手枪的威逼下，哭丧着脸，被迫再拿起武器，开着朝天枪。

担任警署后门主攻指挥的纠察队员，看到“黑狗”们一团混乱，“地头蛇”忙着应付正面防守，知道敌人已中了徐队长的计，于是从隐蔽点冲出来，向警署投去一颗手榴弹。轰的一声，天崩地裂，把后门炸了一个大缺口，臂佩红色袖标的工人纠

察队员，象突然暴发的山洪，从缺口处向警署后院里冲去，惊得在底层顽抗的“黑狗”丢盔弃甲，直往楼上钻。“地头蛇”猛听得背后一声巨响，仿佛大队人马从天而降，急得象条垂死的疯狗，干嚎了几声。牛巡官和几个亡命之徒便掉转机枪，向楼下扫射。机枪声在工人群众的冲杀声中，显得极为微弱，象野兽临死前的呻吟。牛巡官看到工人纠察队已经冲进底楼了，急得双脚直跳，他嫌“黑狗”们射击的速度太慢，将两个“黑狗”往边上一推，自己赤膊上阵，抱起机枪向下扫射。

“地头蛇”的喊叫和机枪的嚎叫，徐文思在前门听得很清楚，他似乎看到了他们那副穷凶极恶的狰狞面目。“黑狗”们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就靠这挺机枪苟延残喘，只要把它打哑，不怕警署拿不下！想到这里，他顾不得任何危险，闪身从怀里掏出那颗唯一的手榴弹，用尽全身力气投进了警署。这颗手榴弹，凝聚着满腔怒火，迸发出嗞嗞的呼啸，飞进了敌人的心脏。那个牛巡官正抱着机枪呲牙咧嘴地尖声怪叫，忽见一个黑影向他飞去，顿时慌了手脚，想逃迈不开步，欲喊叫不出声。“轰”！一声巨响，警察署被炸得摇摇欲坠，署内“黑狗”死的死，伤的伤，那个牛巡官也被炸得血肉横飞。

“机枪哑了，冲呀！”原先被机枪堵在后院和楼下的工人纠察队员，一见警署失去控制，一个个都跃起身来，冲进屋内，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夺枪战斗。楼上有些“黑狗”，本来就怕死，一看牛巡官被打死，“地头蛇”也不知去向，顿时乱成一团，象群无头苍蝇，四散逃命。有几个“黑狗”奔向机枪，妄图负隅顽抗，工人们怒不可遏，挥舞着手中的斧头，短棍，向这一小撮顽固敌人猛打猛砍，他们完全失去招架之力，被迫放下武器，跪在地上，象鸡啄米似的不停地磕头求饶，昔日的威风，刚才

的嚣张气焰，一瞬间都被工人的声势扫得无影无踪。一个工友抱起那挺机枪，高兴地说：“嘿！这可给我们夺回来啦，夺回来啦！”

正当警察署里一场激烈的缴枪、夺枪战斗进行着的时候，分队长徐文思同志牺牲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很快在工人纠察队中间传开了，队员们个个义愤填膺。拿太平斧的青年队员，以沉痛的心情向大家回忆了队长在生命垂危时还鼓励大家努力战斗，奋勇夺枪的情景。

原来徐文思同志为了打垮敌人机枪封锁，奋勇向警署投出一颗手榴弹时，他觉得胸前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推了一下，脑子里一阵晕眩，但他仍顽强地朝前冲了几步，顺势扑倒在警察署的大门前。后面的一个队员见队长又一次负伤，连忙赶上前扶住他，徐文思知道自己不行了，但想到警署里的战斗，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力量啊！于是，他努力用右手向前方一指，说：“别管我，快劈门，缴枪要紧！……”这个队员含着热泪，飞步上前，抡起手中的太平斧，对准大门，不顾一切地又砍又劈，“哗啦”一声门开了，他冲了进去，后面的队员赶上来也冲了进去，和大家一起战斗。

战斗结束了，工人纠察队缴获了所有“黑狗”的武器，但发现不见了平日作恶多端的“地头蛇”。这可奇怪了，刚才大家还听到他在嚎叫，难道一眨眼飞了不成？搜！狡猾的“地头蛇”哪里去了呢？原来他见“黑狗”死的死，降的降，大势已去，又不甘心灭亡，偷偷溜进内室，匆匆忙忙化好了装，伺机潜逃。工人纠察队警惕地来到楼上，从一间暗室的角落里，终于找到了这个已吓得象条死狗般的“地头蛇”。只见他那身笔挺的黑制服外面，歪歪斜斜地罩上了一件衣纹皱皱的长衫。大家

万丈怒火，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对“地头蛇”更加切齿痛恨，恨不得一拳砸扁了他。接过徐文思那支匣子枪的队员，掂了掂手中枪的分量，一字一句地向大家宣布：把“地头蛇”交给工人群众审判！“地头蛇”脸色灰白，四肢痉挛，瘫倒在一边……

工人胜利了，五区警察署摧毁了。

胜利鼓舞了群众，斗争动员了群众。更多的工人群众自动拿起了枪，加入了工人纠察队的行列。

“打倒列强！”

“打倒军阀！”

“工人阶级万岁！”

雄壮、响亮的口号声，象春雷一样滚过长空。

战斗在召唤。商务印书馆工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武器武装了自己，如同猛虎添翼，英勇非凡。他们唱着《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歌谣，迈着雄健的步伐，根据党的指示，奔赴又一个新的战场。最后，他们和闸北，沪西，沪东，邮务，海关，纱厂等方面的纠察队会师一道，经过两天一夜的激烈战斗，分别将湖州会馆、东方图书馆、北火车站等处军阀据点里的残兵败将彻底击溃，赢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

怡和啤酒厂亏损的秘密

啤酒是棵“摇钱树”

一九三五年，在英商怡和洋行企业名单中，又添上了一个“怡和啤酒厂”（即现在的华光啤酒厂的前身）。提起怡和洋行，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帝国主义干下的强盗行径，怡和洋行是在罪恶的鸦片贸易中起家的。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它是一个策划者和参与者。鸦片战争以后，英帝与腐朽的清王朝签订了《南京条约》，怡和洋行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放手大做鸦片买卖，在每年流入中国的大批鸦片中，它占有的份额最大。帝国主义冒险家们用鸦片这种杀人不见血的麻醉剂，毒害中国人民，养肥他们自己。几年以后，这个原来规模并不怎么大的怡和洋行，便一跃为垄断中国进出口交易的“洋行之王”。怡和洋行的两个老板渣甸和马地臣，原来都是英国的流氓，当他们吸饱了中国人民的血回国时，都变成了百万富翁，当上了议员、爵士，成为政界的显赫人物。

帝国主义强盗的侵略和掠夺，是没有止境的。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怡和洋行又用它在鸦片贸易中搜刮得来的钱，在中国开起了一月月工厂。尤其在旧上海，到处可以看到“怡和”的名字，什么怡和纱厂、怡和蛋厂、怡和毛纺厂……每一月厂，都是怡和洋行伸向中国人民的一根吸血管。只要有血可吸，

有钱可赚的行当，怡和洋行马上就会象苍蝇见了血一样紧紧叮上去。不久，洋行老板发现，啤酒也是棵“摇钱树”。

啤酒和香烟一样，随着旧中国殖民地化的加深，象潮水般涌进了中国。当初，啤酒全靠从外国进口，后来需要量越来越大，光靠进口不行了。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一家家外商经营的啤酒厂就纷纷在中国建立了起来。

由于在中国办厂，可以省去关税、运费，更主要的是可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所以生产啤酒比从外国进口的成本低，售价也低，可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使洋老板们大发横财。就拿当时英国人经营的友联啤酒厂（简称“友啤”）来说吧，一九三二年，由于有八千名左右英国军队和其他外国军队闯进上海，使得“友啤”这一年“生意兴旺”达到了顶点，七月份一个月的销售额就达三十二万元。这种情况，使得怡和洋行的老板，垂涎三尺。

怡和洋行当时的一个职员寇克认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啤酒市场。“在这个领域，商业还有广阔的用武之地。”他建议要生产一种价钱便宜的啤酒，如果中国人都吃啤酒，“利润就会滚滚而来”。怡和洋行老板办啤酒厂的心情就更加迫不及待了。

于是，从一九三三年开始，怡和洋行便买了机器造了厂房。一九三六年生产出了第一缸酒。吹吹打打，怡和啤酒厂就算正式开张了。从那以后，一瓶瓶啤酒就源源不断地从这儿运出去，而大批的金钱，也源源不断地流进洋老板的腰包。

吸血的“文明”管理

洋老板经常标榜自己对工厂是“文明”管理，用的是最“新



式”的机器等，不但自己吹，还要别人帮着吹。一九三七年夏天，洋老板在啤酒厂大设宴会，招待新闻界人士。他们捧出最好的冰冻啤酒，请记者们喝，还带他们参观所谓“新式机器”。第二天，上海各报都刊登了替怡和啤酒厂捧场的文章，内称：“怡和啤酒厂之机器均为最新式者，在远东啤酒制造业中可谓首屈一指”，“全厂工人只有五十余名者，盖其工作大都为掌管机器而已”。

吹得多好听。殊不知从这儿出去的每一瓶啤酒都是工人的血和汗啊！在资本家手里，机器越是新式，转速越快，工人的劳动强度就越大。在啤酒厂“伺候”这些机器的，大多是十多岁的童工，剥削就更残酷了。在怡和啤酒厂的“洋瓶间”里，有一部巨大的洗瓶机，在这部机器的进口处，立着三个瘦弱矮小的童工。只见他们不停地弯腰、低头，把整个身体探进一只又深又大的木箱里。将空瓶一只只取出来，再踮起脚尖把空瓶朝又高又大的洗瓶机里塞。洗瓶机转个不停，孩子们也弯腰、低头，踮着脚尖忙个不停。一天工作十小时，上上下下不知要有几千次，连一分钟也不能休息。

英国资本家雇佣童工是有“悠久历史”的。怡和洋行老板更懂得雇佣童工能榨取更多剩余价值。在啤酒厂里，童工就占全厂职工人数的三分之二，他们干的大人活，工资却只有成年工人的一半。洋老板通过大大小小的工头，把孩子们一个个钉牢在机器上。“新式机器”榨干了中国工人的血汗，夺去了多少中国孩子们的童年啊！

为了攫取巨额利润，洋老板还拚命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工人们出尽牛马力，工资却少得可怜，一个成年工人一天也只能拿到七、八角钱，就是这点钱，洋老板还要从苍糠里榨油，罚

工钱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洋大班雷纳有一副专门用来监视工人工作的望远镜，工人们只要屁股一沾凳，就要被罚工钱；聚在一起讲两句话又要罚。洋老板罚起工人工钱来心狠手辣，从三角、五角直到几块十几块。工人们辛辛苦苦做了一个月，本来工资就很微薄，再被洋老板七扣八扣，这样到手就没有多少钱了。有时，甚至一个月的工钱连赔“罚款”都不够。在残酷的剥削压迫下，工人的生活比黄连还苦。许多人白天厂里做苦工，晚上还要去拉黄包车，直到深夜。尽管这样，还是养不活一家老小。

“亏损”的秘密

帝国主义是明火执仗的强盗，又是花言巧语的骗子。怡和洋行在经营啤酒业中明明是大发横财，却偏偏要说成这是赔钱的买卖，给自己披上一件“造福于中国人民”的漂亮外衣。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年三年中，怡和啤酒厂的产量逐年上升，可是在洋老板的帐簿上，却每年都记载着“亏损”数字。一九三八年产量最高，帐面上的“亏损”数字也最大。

怡和啤酒厂帐面上的“亏损”数字，是洋老板放出的烟幕。洋老板想用它来蒙混中国人民的眼睛，平息中国工人反抗剥削、反抗压迫的怒火。每当啤酒厂工人实在忍受不了残酷的剥削、压迫，起来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时候，洋老板总是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有时还要捧出一叠帐簿，在工人面前大叹“亏损”经。

但是，“亏损”谎言骗不了中国工人。起来斗争的工人，只要一听到洋老板嘴里吐出“亏损”两个字，愤怒的责问声就会

连珠炮般地向他飞去。

“‘亏损’？你们在银行里的那一笔笔存款是从哪儿来的？”

“产量年年升，‘亏损’年年喊，你们那本帐是怎么算的？”

“你们的帐，我们不相信！”

是啊，洋老板的帐簿上，满纸谎言，谁也不能相信。可是就是在他们自己的帐簿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洋老板竭力制造“亏损”的卑劣手法和险恶用心。

例如一九三八年的“支出”额上，有付给汇丰银行的“利息”二十六万九千多元。众所周知，汇丰银行是旧上海最大的一家帝国主义银行，而汇丰银行的最大股东便是怡和洋行。怡和洋行大班曾经多次担任过“汇丰”董事长，“怡和”付给汇丰的“利息”实际上就是存在“汇丰”的一笔存款，光是这一笔，老板从上衣口袋拿出装到裤子口袋中的钱，就比这一年的“亏损”总数还要多。

在洋老板的帐簿上，象这样的“混帐”还多得很。洋老板有时虚报从国外进口的原料价格，在帐面上提高“成本”；有时在外汇汇率上玩花样；有时“移花接木”，将不是啤酒厂的支出硬划过来；有时“巨款化细”，分散目标，将所得的利润随意分给自己的亲信，实际上还是落入自己的腰包；有时“放长线，钓大鱼”，用大笔的钱去做广告，为今后啤酒打开市场铺平道路……。这些钱，都被洋老板巧立名目，算在生产成本之内。

最叫工人们气愤的是，洋老板还将分给啤酒厂其他洋人的利润也算作生产成本。啤酒厂共有十个外国高级职员，这十个外国人骑在广大工人头上，统治着整个啤酒厂，工人们都叫他们洋鬼子。这些洋鬼子来到中国，只抱着一个目的：淘金挖银，吸吮中国人民的血汗。管理处有个英国人，工人们都叫

他“土匪”，这家伙刚来上海时，只有一只拎箱，一件雨衣，冬天用雨衣当大衣，冻得涕泪直流。三年后回国时，打包物资的清单用外文打印了好几页，托运了好几卡车。厂内的大班雷纳，本是德籍犹太人，在厂几年的工夫，他就大发洋财，并在国外银行存有巨款。

为什么这些家伙都成了暴发户？还不是因为吸工人的血！一九三八年，这十个洋鬼子所得工资总额为十六万二千七百多元，而同期全厂一百多名职工的工资总额只有二万二千三百多元。洋大班雷纳一个人的工资就比全厂工人全部工资的二倍还多！这十个洋鬼子，都是吸血鬼，有的家伙本身还是怡和洋行的重要成员，这些人，洋行每年都要分一笔利润给他们，这笔利润也被老板以“工资”的名义算作“成本”。工人们气愤地说，这些洋鬼子是强盗，坐地分赃后还要讲“亏损”，他们的心肠真是比煤炭还要黑！

就是从洋老板那象迷魂阵似的帐面上来分析，一九三八年，啤酒厂的帐面上的盈利也达到了三十五万七千五百多元（将付给汇丰银行的利息，洋人高工资等一笔笔“混帐”加起来，再减去洋老板虚报的“亏损”数）。

你看，明明大发横财，偏说连年“亏损”，这正应了中国一句俗话：“此地无银三百两”。果然，事隔几年，资本家忽然又不惜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不打自招地供认“盈利”了。

抽资金嫁祸于人

一九四〇年十月，洋老板突然又宣布这一年的上半年怡和啤酒厂就赚了六十一万八千二百多元，一下子改变了连年

“亏损”的局面。一会儿狂叫“亏损”，一会儿又大喊赚钱，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九四〇年世界局势激烈动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烧遍了全球。由于大片中国领土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受到了严重威胁。当然英、美帝国主义是不会甘心的。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的争夺已经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了。上海是英、美势力和日本势力争夺最激烈的地方，火药味就更浓。租界已被日本军队围死，成了孤岛，日本海军陆战队随时准备打进租界。有着几十年侵略经验的怡和洋行，早就嗅出了这股火药味，他们感觉到租界上的怡和洋行企业，快要保不住了。洋老板灵机一动，决定把这场灾难转嫁给中国人民。于是，怡和洋行便搞了个“怡和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的骗局，企图通过出卖股票，从剥削一个厂的工人，扩大到剥削更多的中国人民。

现在，他们发起筹办“怡和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名称一变，无数的金钱又流进了他们的腰包。怡和洋行在投资办啤酒厂时，只花了四百万元，变成“股份公司”时，洋老板虚报资本为二千万元，比原来的资本整整扩大了五倍！这有名无实的二千万元，洋老板再将它分成四百万股，每股票面额五元，到市面上公开发售。为了兜售这么许多股票，怡和洋行老板一反过去“亏损”常态，大叫大喊企业怎样怎样赚钱。唯恐人家不相信，还公布什么“查帐报告”，说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所以企业又盈利了。然而上当的人仍然很少。四百万张股票，只卖出了一百四十万股，其中参加原合伙企业的怡和洋行占百分之二十，另一个洋行海姆和赫立森占百分之十七，其余华股占百分之六十三。

股票票面额明明是五元，但出卖给中国人时，要按六元出售，说是估计到将来企业要赚钱，要发红利。这样一来，又搜刮去了近百万元。

这样七搞八搞，怡和洋行差不多把它当初投资办啤酒厂的钱全部捞了回来。你看，怡和洋行抢劫中国人民血汗的胃口有多大！怡和洋行在这所有股票总额中占百分之二十，仍是最大的股东，为它以后重新统治啤酒厂作好了准备。这些洋老板真是比豺狼还贪婪，比狐狸还狡猾。

就在怡和洋行搞了“怡和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的骗局以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占领租界，一九四二年一月十日日寇派人“军管”了怡和啤酒厂。这时，啤酒厂的大量现款已经被转移到了国外，而成千上万张被洋老板用花言巧语抛出去的股票，便成了废纸一张。

洋老板昨天讲“亏损”，今天喊“盈利”，丑态出尽。

啤酒工人斗洋鬼

洋老板自以为凭他手里的炮舰，凭他那种能把黑说成白，把死说成活的如簧巧舌，就可以稳坐他们的“天堂”。但是，炮舰吓不倒中国人民，谎言更骗不了中国工人，洋老板越是凶狠、狡猾，工人的反抗就越是激烈。在英国鬼子统治啤酒厂的十几年间，工人们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罢工浪潮，斗得洋老板焦头烂额。洋老板为了镇压工人斗争，软的，硬的，什么手段都使尽了。但是，都不能使中国工人屈服。就拿一九三九年那次罢工来说吧。那时，日本鬼子占领了上海，市面上物价一日三涨，工人们实在活不下去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了罢工斗

争,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狡猾的洋老板,除了勾结巡捕房,逮捕工人代表,镇压工人的罢工斗争以外,又大唱什么“亏损经”。这时,工人兄弟看到自己的代表被逮捕,又听了洋鬼子的谎言,气得怒火万丈。大家当即决定,将啤酒厂的心脏部门冷冻间和锅炉房的机器停下来,这一下可击中了洋老板的要害,因为这两个部门一停,不但整个啤酒厂要瘫痪,连储存在酒缸里的所有半制品啤酒,都要因为没有冷气而全部坏掉,这笔损失可就大了。洋老板狗急跳墙,马上到外面重金雇了一批外国流氓,想让他们来开冷冻车,烧锅炉。

工人们早就预料到这一着,外国流氓们还没有闯进厂门,就被守候在那里的童工们发现了。只听一声怒喝:“打!”霎时,童工们的石头、砖头、啤酒瓶便朝外国流氓们雨点般飞去。成年工人也立刻赶来参加战斗,打得外国流氓们抱头鼠窜,一个也没能溜进厂。

洋老板看看软的不成,硬的又不行,眼看缸里的啤酒马上就要朝阴沟里倒,更加心疼。最后只好低下头来,收回了“亏损”谎言,把捉进巡捕房里去的工人代表乖乖地放了出来,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全部条件。

几十年来,怡和洋行通过啤酒厂这根吸血管,掠夺了中国人民多少血汗钱!这笔帐虽然从洋行资本家那本“亏损”帐上是统计不出来的。但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剥削,就是造成中国人民长期贫穷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今世界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干的就是当年英帝国主义干的罪恶勾当。但是,苏修、美帝的掠夺、剥削,只会激起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日益觉醒和坚决反抗。

面包工人痛打洋鬼子

上海益民食品四厂的前身，是“沙利文面包厂”。解放前，这家美帝国主义开设的面包厂，成了剥削中国工人的吸血管，香喷喷的奶油面包，浸透了我们工人阶级的血汗。

一九一二年，美帝国主义分子沙利文踏进上海滩，先在南京东路（原抛球场）开了爿小糖果店。随着资本的扩大，他又纠合一批洋奴买办，在虹口开设了一家沙利文面包厂。由于这个帝国主义分子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残酷地压榨和剥削中国工人，资本越来越雄厚，在中国工人的血汗和白骨堆上，又先后开设了几家饼干、糖果厂，一九三二年，还在新闻路造了一幢高大的厂房，这个帝国主义分子，十年间摇身一变，竟成了上海滩上一位声名赫赫的百万富翁。

沙利文面包厂的工人，每天必须干十二、三个小时，甚至十六小时的活，起早摸黑，终日做牛马。到了六、七月的炎热盛夏，工人们更是痛苦不已。厂房四周只有玻璃墙，而无通风的玻璃窗。工人们在华氏一百二十度的“蒸笼”里劳动，许多工人做得头昏目眩，昏倒在车间里，阶级兄弟只能用冷水将昏倒的工人喷醒，扶到较凉爽的地方，瞒着帝国主义老板，休息片刻后还得继续干。做饼干的工人，长年累月地在热气炙人的机器旁边拚死拚活地干。每天每个工人用手工将重达十八市斤的饼干坯和铁板不停地往炉子里送，饼干被烤熟后，又要

用双手将炽热的铁板从炉子里取出来，然后再将饼干一铁盘一铁盘地倒在竹箩筐里，再搬到三楼包装间，这样每天工人手里经过几万斤重的东西，往返路程达三十六里。

工人一天十几小时的劳动，又不能在厂里吃饭。厂里的食堂是供老板和高级职员用的。为了防止工人吃厂里的面包、饼干，沙利文面包厂的老板不许工人带饭进厂，工人饿着肚子，象牛马一样的劳动。正是：身在面包旁，心里饿得慌，手包甜奶糖，满肚黄连汤。

沙利文面包厂的老板雇佣了许多监视工人的工头，为压迫和剥削中国工人设置了许多暗哨。这些工头大多数是外国人，他们为了讨好主子，常常对工人进行突然袭击，更恶劣的是无中生有，造谣生事，对工人进行毒打、罚款，不少工人经常因此而被踢出厂门。

沙利文面包厂工头中，有一个外号叫“猫头鹰”的家伙。他生得矮胖，鼻子勾得象鹰嘴，绿眼睛凶光闪闪，因为他惯于夜里出没车间监视工人，大家就干脆叫他“猫头鹰”。

“猫头鹰”平时诡计多端，常常鬼头鬼脑地出现在车间，抓工人的“差错”，向老板报功。因而深得老板的称赞。

一九三八年的一天晚上，面包车间的一个工头喝得醉醺醺地躺在灶旁，象一头死猪睡得不省人事。老工人胡师傅和青年工人阿根汗流浹背地干了十来个小时的活，肚子饿得咕咕叫，眼睛直冒金星，看到这个工头酒醉如泥，“猫头鹰”又不在车间，老胡暗暗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冷馒头。

“阿根，来歇会儿，我这儿还有个馒头，咱俩分吃了，充充饥。”

“不，我不饿。”

阿根虽然肚子很饿，但想到师傅年纪大，一天下来还没进过一点食，应该让师傅多吃点，就推托不饿，老胡却早将半只馒头塞在阿根手中，师徒俩坐在炉子后面吃了起来。

不料，这时“猫头鹰”贼头贼脑地摸进了车间，他东瞧瞧，西看看，忽然看见老胡与阿根坐在炉子背后，刚想开口辱骂，仔细一看两人嘴巴在动，分明是在吃东西。再一看，嘴角边上还有余屑，肯定是偷吃了面包。“猫头鹰”心想向老板表功的好机会又到了，就上前一把抓住两人的衣领，恶狠狠地喊道：“好呀，你们偷吃面包，告诉大班，把你们‘铜牌’拿掉。”把“铜牌”拿掉意味着开除出厂。老胡和阿根一听，怒火中烧，霍地站起，老胡转身一把抓住“猫头鹰”的衣服，一手扬了扬咬剩的一小块馒头：

“你睁开眼睛看看清楚，这是面包还是馒头？”

“猫头鹰”一看是馒头，知道搞错了，但他不死心，嘶哑着嗓子喊着：“谁叫你们在厂里吃东西？谁知道你们是吃面包还是吃馒头？”

“谁偷面包吃？”

这时许多工人都围了上来，“猫头鹰”一看苗头不对，连忙溜出了人群。他又气又恨，绞尽脑汁要出这口气。

有一天夜里，“猫头鹰”又偷偷地来到车间，正巧看到工人宋阿四将一只奶油听头送进炉膛烧东西，他想这些穷工人又在烧东西吃了，要照以前的办法，他肯定又要大喊大骂，这回他却躲在旁边看着，他想等工人一张口吃，就来抓。“猫头鹰”心里乐滋滋的，一直等到宋阿四将那只热气腾腾的听头端出来，用碗倒好送到嘴边的时候，他马上凶神恶煞般地跳了出来，大声喊道：“宋阿四，你胆子倒不小，你在吃什么？”宋阿四

也不理他，只顾自己端着碗喝。

“听见没有，你在吃什么？”

宋阿四将碗朝“猫头鹰”面前一伸，冷冷地说道：“你没长眼睛呀，这是什么，你自己看。”

“啊，开水？”

“猫头鹰”一看不由一怔，原来宋阿四烧的是开水。但是，他仍旧粗着嗓子喊：

“开水也不准喝！”

“为什么不准喝？不给饭吃，难道水也不让喝？”宋阿四理直气壮地说。

“不准喝就是不准喝。”

“猫头鹰”一边骂一边心里想：“这小子，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不知道我的厉害。”他拎起这听开水朝宋阿四身上浇去。“猫头鹰”的暴行，激起了大家的愤怒，许多工人围了上来，宋阿四气愤地咬着牙，一步上前揪住“猫头鹰”的衣领，“猫头鹰”挣扎着，抱着脑袋往外逃去。“猫头鹰”逃走后，工人们怒火未消，恨不得把“猫头鹰”揍一顿。平时他对工人一贯欺压，大家打心眼里恨透了他。今天，他又无中生有，对工人横加迫害，一定要给他个厉害看看！于是，几个工人凑在一起，你出个主意，我想个点子，商量如何对付“猫头鹰”的办法。有个工人说：“以往‘猫头鹰’常来车间拿面包吃，我们就趁他来拿的时候，把他当作偷面包的贼，狠狠揍他一顿。”大家听了都表示同意。

一天中午，“猫头鹰”象往常一样，大模大样地来到面包车间，兜了一个圈子，靠近了面包架。这时，工人们早已作好了准备，监视着他的行动。大家心想他来了，好！这回要痛痛快快地教训教训他。

“猫头鹰”逐渐进入了工人的“伏击圈”，工人象平常一样在做面包，不时互相用眼色示意，传递通知，就等“猫头鹰”伸手拿面包了。

“猫头鹰”走到面包架边，伸出一只毛茸茸的手，拿了只大面包，就要走。刹时阿根一个箭步窜到他的面前，一把抓住“猫头鹰”拿面包的手，叫了起来：“捉偷面包的贼啊！”

事先经过周密安排的工人们提着木棍，闻声而来。将“猫头鹰”团团围在当中。阿根两手叉在腰间，怒目面对“猫头鹰”。“上回的事你知道吗？”“猫头鹰”两手一摊，嘟嚷着：“不知道……”

阿根上去用手指着“猫头鹰”鼻子质问：“什么不知道？上回我们工人没有拿面包吃，你硬说我们偷面包吃。我问你？偷面包的究竟是谁？快回答！”“猫头鹰”瞪着眼睛，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大菜间面包没有啦，肚子饿，晓得吗？”工人宋阿四向前紧逼一句：“你也晓得肚子饿吗？那么，我们工人的肚子饿就不晓得吗？”有的工人指着“猫头鹰”说：“老板为什么不许我们带饭进厂！我们工人饿着肚子做面包你晓得吗？”

“猫头鹰”被工人团团围住，明知理屈词穷，便吊起了三角眼，伸出一只小手指，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地说：“你们不能吃面包，”又伸出大拇指，说：“我们可以吃面包！”

工人们听了更是怒火万丈。阿根早就摩拳擦掌等着了，这时他猛冲上一步，敏捷地对准“猫头鹰”的脸上“拍！拍！”就是两记耳光，打得“猫头鹰”向后踉跄了两步。其余的工人见阿根动手，就一拥而上，你一拳我一拳，如雨点般地落在“猫头鹰”身上，“猫头鹰”边退边用手挡大家的拳头，一直退到楼梯口。老工人胡开泰伸出铁锤般的拳头，对准他的胸口狠命一

拳，“猫头鹰”活象个柏油桶似地“咚，咚，咚”顺着楼梯，从楼上直滚到楼下，发出呻吟……

“打得好！”“打得好！”工人们看到“猫头鹰”的狼狈相，齐声叫好。“猫头鹰”装死躺了好久，才连滚带爬，跑到大班间报告了洋大班。打在奴才身上，痛在主子心里，洋大班看到奴才吃了大亏，顿时十分恼怒，气势汹汹要找工人算账。不多时，开来了抓人的“香港车”，特务和巡捕如临大敌，把工厂团团包围起来。由“猫头鹰”带领“包打听”来捉工人。工人们早就有了准备，都集中在厂门口的房上，迎接新的战斗。

“包打听”张牙舞爪地叫喊：“谁打外国先生的，唔！快说？”“猫头鹰”跑上去与“包打听”交头接耳，一边对为首的几个工人指指点点。“包打听”指着阿根，恶狠狠地说：“是你打的吗？”阿根昂然挺立回答：“我们打的是偷面包贼，怎么样！”阿根的有力回答，犹如打在“包打听”脸上的一记响亮耳光，对其他工人们是很大的鼓舞。苦难深重的沙利文面包厂工人，怎能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于是大家一个接一个站上前说：“我也打的！”，“我也打的！”声音如山洪暴发，汇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斗争洪流。“包打听”顿时呆若木鸡，不知抓谁好。

工人们围着洋大班高声说：“不惩办‘猫头鹰’，不让我们在厂里吃饭，我们所有的车间统统停止生产。”工人们语气斩钉截铁。“停止生产”四字如利箭直刺美国大班的心窝。要是沙利文面包厂一罢工，其他厂也会罢工，一旦事态扩大，必然要受到上级董事会的指责，管理工厂无能，大班的乌纱帽也有随时被摘掉的危险。想到此地，洋大班硬着头皮跑到广场上，提着破嗓子着急地喊道：“工友们，请大家安静，这是误会……”

洋大班又对巡捕房的家伙连声说：“误会，误会。”“包打听”弄得莫明其妙，又不敢多问，只得夹着尾巴溜了。

工人们集聚在广场上，发出胜利的欢呼。洋大班拱着背，无精打采地倚在门框上。“猫头鹰”站在大班旁边，两手下垂，既不敢走，又不敢坐，活象一条丧家犬。楼下广场上工人们的欢呼声，越来越响，整幢大楼被震动得摇摇欲倒……

愤怒的家庭女工

上了年纪的同志们大概还记得，在旧上海五花八门的广告牌中，有这样一幅广告画：一个人手拿老虎钳，站在牙刷柄上，满头大汗地拔牙刷毛，却一根也拔不掉。这就是梁新记牙刷厂的老板，为了招徕顾客，吹嘘他的牙刷是“一毛不拔”而挖空心思设计的广告。

用“一毛不拔”来形容牙刷的牢度，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但用这句话来形容梁新记老板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倒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一毛不拔”是两千多年前反动思想家杨朱的思想核心。杨朱为了维护和挽救反动奴隶主阶级，竭力宣扬“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反动处世哲学。梁新记牙刷厂的老板正是继承了剥削阶级老祖宗的衣钵，贪得无厌，一毛不拔。

他的剥削手段既狠又毒。其中对家庭女工的剥削和压迫，尤为残酷。“一毛不拔”的牙刷，不知包含了多少工人们的血和泪！“一毛不拔”的资本家正是靠吮吸工人的血汗起家。在清朝光绪末年，梁新记只不过是广东佛山一个小小的牙刷作坊，仅有五、六个工人。但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七年短短十余年中，竟发展为拥有六个制刷工场，十七个门市部，分布在上海等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独霸牙刷市场的“牙刷大王”。

梁新记牙刷厂老板的主要剥削手段之一，就是雇佣家庭



女工。即把大量的穿毛活，分发给厂外的穷苦妇女去干，老板需要她们做工时，就发原料，不需要时，就不发。这些家庭女工报酬极低，这样既可以获取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又可以减少厂房设备和管理费用等支出，连电灯、自来水费用也可以减少。因此，便把雇佣家庭女工看成是“一本万利”的“生财之道”。据一九四〇年统计，当时老板在上海一个厂内雇佣工人约三百余人，而在厂外雇佣的家庭女工竟达七百余名，超过厂内工人两倍多。

这些家庭女工，原来都居住在上海南市斜桥一带。抗日战争时期，那里被日本鬼子占领，成了沦陷区。日本法西斯强盗的“三光”政策，迫使她们离乡背井，怀着阶级仇民族恨，逃难到虹桥路一带的“荒人滩”上。在黑暗的日子里。她们被压在最低层，过着非人的生活。剥削成性的梁新记老板便把她们作为最廉价的劳动力，巧取豪夺，残酷压榨。

为了能填个半饱肚皮，这些家庭女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拿了记账的折子赶到厂门口，领了竹筹子，守候在门外，直到六点钟厂门开时，才能按照竹筹号码到“收发处”排队领料；有时一连等上好几个小时，还是领不到料，只得空着手回家。生活毫无保障。

老板为了多赚钱，对女工的加工时间限制得很紧。逼着家庭女工们日夜赶穿，稍一脱期，就蛮横地收掉她的折子，不许再做。因此，不论酷暑盛夏或是严冬腊月，女工们不仅白天要拚着命做，而且晚上也要在煤油灯下赶穿到天明。实在倦了，就伏在桌沿上打个瞌睡，洗把冷水脸，忍着饥饿再一孔一孔地穿下去。弦线把她们的的手指勒得皮破血流，甚至嵌进肉里，扣入骨头，久而久之，手指便不能伸直，变成残废。当时穿

毛女工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一针对，一孔孔，血染弦线恨满胸，‘一毛不拔’老板凶，黑暗世道太不公！”

广大家庭女工这样日以继夜拚死拚活地干，每月所得的工资却还买不到两斗米，而女工大量的血汗却流进老板腰包。生活贫困到了极点，吃的是难以下咽的豆渣、野菜，穿的是补了又补的“百衲衣”，住的是坑坑洼洼的“滚地龙”，终年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线上。吝啬之极的老板还要女工们自备各种生产工具和用品。因此大家都称他“老刮皮”。

此外，老板还制订了名目繁多的“罚规”，来克扣女工的工资。狡猾的“老刮皮”常常将经过漂洗而未待干透就发料，女工们穿成牙刷后，水份早已蒸发，造成重量短缺。牙刷交货时，“老刮皮”要过磅，如果牙刷重量比发出的原料略少斤两，就逼着工人赔钱。再加上穿毛时短毛散落和断线等损耗，女工们经常被罚款，有的一个月被罚两元之多，占工资收入一半。所以女工们实际上到手的钱已寥寥无几。

另外，老板还设了一道验收关，对成品百般挑剔。稍不如意，工头就恶毒地用老虎钳把整批牙刷每支拔去一两撮毛，迫使女工们全部返工。拔下来的毛，女工们得用开水全部烫直，重新整理后，再逐支穿上，这样一来不但几天生活白做，拔断了的毛和线还得自己赔钱。女工们气愤地说：“我们做得皮破血流，到头来还是饿扁了肚皮，老板真是地地道道的‘一毛不拔’！”

由于老板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人们不断奋起反抗，同老板展开英勇的斗争。一九三九年七月，梁新记牙刷厂受压迫剥削最深的家庭女工首先组织起来，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罢工

斗争，轰动了整个上海。

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国民党反动派顽固地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卖国路线。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组织起来同日本法西斯强盗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而反动的资本家却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对工人加紧剥削和压迫，大发横财，致使工人生活更趋贫困。

梁新记牙刷厂的老板也更加紧了对家庭女工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当时物价飞涨，牙刷的售价一日三跳，家庭女工的实际工资却直线下降。“老刮皮”竟还用拖欠工资等手段，进一步榨取女工们的血汗。当女工们同“老刮皮”交涉，要求发放欠薪时，他竟借口“企业困难”，拿出一些掺有大量泥沙石子的小麦，按大米价格作为工资发放。七月十五日，又宣布将缺毛赔损的价格从原来一钱毛赔两分钱上涨到壹角，这等于又要从女工身上剥下一层皮，女工们再也忍不住了。她们拥在厂门口，发出了一片愤怒的吼声。

“‘老刮皮’实在太狠心了！”

“‘老刮皮’的心肠同日本鬼子一样狠毒！”

“我们同‘老刮皮’拚了！”

“姊妹们！老板逼得我们活不下去了，我们只有团结起来同他们斗啊！”只见人群中走出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工，挥动着拳头对大家喊道，由于她过分的激动和愤怒，嘴唇微微颤动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象要喷出火来一样。她的名字叫李莲桂。

“对！我们一定要跟‘老刮皮’算账！”大家异口同声地高呼着，长期压在心底的怒火，一下子迸发出来了。

第二天傍晚，李莲桂同苦难的姊妹们一起酝酿进行罢工

斗争。李莲桂讲：“对付狡猾的老板光靠我们这几个人不行，人多力量大，我们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如果我们有姊妹被捉进巡捕房，大家也要坚持斗争到底！”商量结果，决定向“老刮皮”提出三个条件：提高穿毛工价；不准提高赔毛价格；立即发放欠薪。为迫使“老刮皮”接受条件，从明天开始不去交货和领料。接着大家便连夜分头串联，每人负责五十户，沈阿二联络虹桥路一带的姊妹。李莲桂联络大木桥一带的姊妹。另一个女工联络南市一带的姊妹……。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七日，一场大规模的家庭女工罢工斗争爆发了，几百名家庭女工聚集在厂外。

“不准提高赔毛价格！”

“立即发放拖欠工资！”

“提高穿毛工价！”

“不答应条件决不复工！”

口号声响彻了肇嘉浜两岸，而厂内“收发处”却冷冷清清。账房先生拨着算盘珠急得直跺脚。阴险狡猾的“老刮皮”看到女工们不来领料，便施出了一条毒计：暗暗地把原料送到漕河泾，想另外雇人加工，企图破坏罢工斗争。女工们得到消息，立即潮涌般地赶到马思南路（现思南路）把货车拦住。“老刮皮”闻讯赶来，立即又被女工们围住。

“不许另雇工人！”

“不许你再继续欺压女工！”

“不答应条件，你就别想离开这儿！”女工们个个怒目圆瞪，步步紧逼。

“老刮皮”吓得连连倒退，结结巴巴地说：“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一双贼眼却骨碌碌地转着，最后目光停留在一个

狗腿子脸上。那狗腿子马上会意，便偷偷挤出人群，打了个电话给卢家湾巡捕房。谎称工人抢劫货物，要求捕人。

不一会，一辆强盗车急驶而来，一群荷枪实弹的法国巡捕象蚂蜂似地一拥而下，端起刺刀就往人群中冲，当即把李莲桂、沈阿二等四名女工抓上了车。

“你们凭什么抓人？”

“我们犯了什么法？”

女工们怒火万丈。立即把“强盗车”围了起来。

这时有人喊道：“姐妹们！要去我们大家一起去！”

“对！我们大家一起去！”女工们边喊着，边争先恐后往车子上跳。

法国巡捕原以为一群女工是经不起一吓的。现在面对这辣手的场面，都惊呆了。不知是往车上拉，还是往车下拖。半晌，那个巡官才气急败坏地喊着：“开车，开车！”巡捕们于是一面用枪托乱打乱砸，一面开了车就跑。女工们便又一齐向巡捕房奔去。

被捕的女工被抓进巡捕房后，面对凶恶的法国强盗，毫不畏惧，厉声责问。在理直气壮的女工面前，法国侵略者目瞪口呆，无言对答，他们想把工人关押起来，但是外面几百名女工在怒吼：

“释放我们的姐妹！”

法国强盗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不得不把四名女工释放了。

第二天，女工代表同“老刮皮”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她们坚持三项条件寸步不让。“老刮皮”面对代表们理直气壮的责问，门外又聚集着几百名愤怒的女工。他知道不好对付，便偷

偷地溜走了。

“老刮皮”如此狡猾，更激起了女工们无比愤怒，她们经过商量，连夜分头到厂内穿毛工人的家里揭露“老刮皮”的丑恶嘴脸，取得了她们的支持，原来“老刮皮”为了加紧剥削又在厂内雇用一批穿毛工人。专门生产一些比较高档的牙刷。这些工人在“老刮皮”的压榨下早已憋不住气了。前几天听到家庭女工已经开始罢工，就准备响应。经过女工们的串联，现在他们再也忍不住了，第二天也全部开始罢工，与家庭女工并肩战斗。

家庭女工和厂内工人分散在肇嘉浜附近的各条马路上，向市民揭露老板的种种剥削罪行。这一斗争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应，取得了全市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他们纷纷赶来声援。一些进步人士还撰稿在报上揭露梁新记老板残酷压榨家庭女工的真相。

“老刮皮”原想，这些穷女工，一天不做活就揭不开锅，饿上几天之后，就会不请自来，何况厂里还有一百多人在穿毛，还能够从中捞回一些。现在不但家庭女工没有屈服，连厂里的穿毛工人也罢了工，而且声势越来越大。一批制成品在家庭女工手里，不能卖出去，半制品又无人加工，无法出售，这样下去损失太大。“老刮皮”象剜了五脏六腑似的心痛，再也施不出鬼计来，到了第六天，他不得不接受了女工们提出的全部要求。

这次斗争的胜利，狠狠打击了资本家的嚣张气焰，给了家庭女工们很大的鼓舞，这就更加坚定了梁新记牙刷厂的工人们斗争的信心。

“三星蚊香”老板“抵制日货”真相

在安远路胶州路口，竖立着一排排厂房，厂门口木牌上写着“上海牙膏厂”几个大字。走进车间，一条条自动流水生产线，排列得整整齐齐；履带有节奏地运转，伴随着马达的欢叫，如银龙在翩翩起舞，又象是一队训练有素的士兵在紧张地操练。一盏盏“红灯”光芒四射，一片片“绿叶”春意盎然，一朵朵“蓓蕾”含苞欲放……整个工厂充满着革命的活力。这里每年要生产上亿支各种牙膏，运往祖国各地。大家熟悉的“美加净”牙膏，更深受国内外人民的欢迎，享有很高声誉。看到这在大跃进的年代里诞生，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中成长壮大的上海牙膏厂，看到这些由中国工人自己制造的新产品，怎能不叫人心情激动，怎能不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而感到无限自豪！同时，也不由此使人想起，就是这个厂的资本家在抗战时期勾结日寇汉奸，把用日本原料做的“三星蚊香”冒充国货，欺骗人民，大发国难财的罪恶历史来……

上海牙膏厂的前身叫“中国化学工业社”，建于一九一二年，是我国最早的一家日用化学厂。当时，老板方液仙在城隍庙附近租了一个亭子间，雇了一个工人，上午靠这个工人生产一些雪花膏，下午再叫他挑着雪花膏沿街推销。随着规模的越来越大，方液仙千方百计地残酷剥削工人。到一九三一年时，已有了一个公司（也叫发行所）及三个附属工厂，生产牙

膏、味精、蚊香等一百多种产品，方液仙也成了—一个拥有四十万资本的大资本家。

一九三一年“九·—八”以后，东北三省沦陷。蒋介石顽固地推行不抵抗主义，把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拯救祖国，拯救在日寇铁蹄下践踏的苦难同胞，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长驱二万五千里，历经艰险，北上抗日，力挽狂澜，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各地燃起抗日烽火，四万万同胞动员起来了。

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同时，—一个抵制日货，反对日寇经济渗透的爱国运动在全国各地也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曾经在—国内大量倾销的日本“野猪牌”蚊香，这时再也无人问津。而中国化学工业社生产的“三星蚊香”，靠着“国货凭证”的招牌，顿时红了起来，成了热门货，以所谓“中国国货公司”创办人自居的方液仙因而也自我吹嘘是“抗日有功”。

大家会感到很奇怪，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方液仙，怎么摇身—一变成了“爱国资本家”？“三星蚊香”是地地道道的国货吗？不！这是方液仙搞的—一场以假充真、大发国难财的鬼把戏。“三星蚊香”是方液仙这只毒蚊趁抗日运动开展之机，吮吸人民鲜血的—根毒针。

原先，“三星蚊香”中的主要原料除虫菊—一直是从日本进口的。“九·—八”以后，方液仙假惺惺地把他的驻日采办员从日本调回国，表面上和日本断绝往来，暗地里却继续从日本进口除虫菊。日寇随着侵略战争规模的扩大，国内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农业日益衰退，大量原来种除虫菊的田地纷纷改种粮食，除虫菊生产—一下减了大半。方液仙知道这个消息后紧张万分，重派采办员火速去日本找“大正除虫菊株式会社”的

老板，奴颜婢膝地乞求他们照顾老关系，尽可能多供应一些除虫菊。方液仙害怕日货运到中国后会引起公愤，遭到抵制，戳穿“国货”的假面具，就和日本“大正除虫菊株式会社”秘密商定，由中国化学工业社委托美国一个名叫“庇乃克”的商行向日本进口，然后来个改头换面，再由美国运往中国，以此来掩人耳目，继续干它的卖国勾当。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又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对华三原则”的侵略计划。方液仙的这一肮脏交易完全迎合了日本侵略者的需要。就这样，把一张太阳旗商标改成星条旗商标，日本的除虫菊又畅通无阻地运进中国，而且每年的进口量比抗战前增加数十倍，达五十几吨之多。如果说蚊子毒，就在于它要吸人的血，而资本家方液仙却比毒蚊还要狠毒千百倍，只要工人身上还有一滴血可以吸，一根筋可以抽的时候，他是决不会放过的。什么“爱国”呀，“抵制日货”呀，统统是骗人的鬼话，只要有利可图，什么卑鄙的事他都干得出来。他以最低的工资，招收了大批女工。为了最大限度的剥削，烤香根本就没有烘房，而是放在太阳下晒。所以每天一上班，就迫使女工们把装满蚊香的箩从楼上抬下来，然后再把蚊香一盘一盘摊开晒。炎夏，炙热的太阳烤着大地，工人们弓着腰，背顶烈日，要在场地上来回奔跑翻晒三、四个小时。中暑发痧的不计其数。资本家又用计件工资这条绳索勒在工人的脖子上，迫使工人象牛马一样，一晒完香，马上又要钻进黑洞洞的又闷又热的厂房里去盘香。工人拚死拚活卖命干一天的所得，还难以糊口。

雷雨季节，天气变化无常。经常是好好的晴天，一会儿就象翻了脸似的，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倾盆大雨来。这时，资本家和他的走狗却逼着工人朝雨里冲，要工人在最短的时

间里将几十万盘香收进屋。还说：“天下雨，只准蚊香进屋，不准工人进屋”。工人们眼里喷着火，气愤地说：“牛马在下雨天还可以进棚躲雨，我们反而要在雨里跑，真比牛马还不如。”工人在暴雨中淋湿了衣服，又没有换的，只能穿着湿衣服再盘蚊香，由于长时期的折磨，很多工人得了伤寒病，弄得面黄肌瘦，含恨病死。那时厂门前有条臭水浜，里面什么烂脏杂物都有，终年散发臭气，夏天一下雨，这条臭水浜就黑水暴涨，臭水夹杂着垃圾淌进工场，熏得人直想呕吐。资本家保香如保命，叫工人赶快把桌子垫高，使蚊香浸不着水，至于工人的死活，资本家是根本不管的。工人两只脚只好整天泡在齐膝深的臭水里操作，一连泡好几天，有的烂了脚，有的得了关节炎。有个女工做了五年蚊香，积劳成疾，骨瘦如柴。有一天正遇雷雨，狗腿子自己撑着伞，却逼着她冒雨抢收蚊香，当时她已怀孕近六个月，不肯去，狼心狗肺的狗腿子就恶狠狠地威胁说：“不收就滚出去！”又一把抓住她往雨里推，她咬着牙拖着病体收完蚊香回来，就发了高烧，得了伤寒病，一病不起。在那年月里，工人连饭也吃不饱，一生病生活就更困难了。没几天这位女工就离开了人世。方液仙这只毒蚊一口就夺去了两条人命。

方液仙这只毒蚊为了推销商品，施展种种手段，为“三星蚊香”大吹大擂，欺世盗名。比如，那些老爷、小姐经常到杭州西湖游山玩水，寻欢作乐。方液仙一眼看中这个地方，就在每条游览的船上张贴“国货三星蚊香”的醒目广告，扩大影响，招徕顾客。

方液仙不仅做死广告，还搞了“三星蚊香”原料除虫菊的活标本。他们在上海市郊虞姬墩、白朗渡、西浜等几个地方搞了些田种上除虫菊，装模作样地叫“试验田”，经常请人参观。

尤其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间，方液仙别出心裁地搞了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事先，他们发出大量请帖，请当时所谓社会名流，各厂商单位去参观。因为虞姬墩离开市区较远，资本家包下了当时上海最大的祥生汽车公司的全部客车，去参观的人免费接送。到了参观的那天，上海的一些官僚买办也坐了小汽车光临，成了座上宾。那些记者自然在被邀之列，各厂商的代表也蜂拥而至，共有几千人。方液仙自吹自擂如何抵制日货，用国产原料制造“三星蚊香”。他又是解说，又是照相，还发什么《除虫菊栽培方法》的小册子，乱哄哄的搞了整整一天。果然，没过三天，大幅大幅的除虫菊照片上了报纸，文人骚客们为“三星蚊香”捧场的文章充塞版面，一时乌烟瘴气，“三星蚊香”煞有介事地带上了“国货”的桂冠，不仅国内的销路大增，还运销到东南亚一带欺骗爱国侨胞。其实这“试验田”里种的除虫菊还不够厂里生产一星期。

这还不算，为了掩盖他勾结日寇，挂羊头卖狗肉的罪恶，资本家又进一步想了个“名利双收”的办法，即在温州大罗山及杭州附近、江苏海门一带诱骗农民种植除虫菊。他们专门派人去宣传，说什么“奉送”种子，介绍方法，高价收购，许下各种诺言，说得天花乱坠。不少农民试种了，好不容易盼到收获时，往往遇上霉雨季节，一下雨来不及收，根也烂，花也落，所收无几。又因为连年战争，交通经常阻塞，中断，不能及时卖出去，时间一长就要降低有效成份。结果“除虫菊”成了“害人花”，倒霉的当然是农民，辛辛苦苦而落了一场空。资本家一则可以用各种借口低价收购，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二则又能以“自产原料”为招牌，扩大宣传，博得个“爱国”美名，进一步欺骗群众。

在这段时间里，被吹捧为抵制日货“有功”的“三星蚊香”，简直成了方液仙的摇钱树，蚊香利润达百分之一百四十一之多。资本家每年生产三个月蚊香，整个厂一年的开销就足足有余了。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一年这十年中，资本家不仅增设了专门生产肥皂的第四厂和重庆分厂，而且还在南京、杭州、汉口、广州、重庆、长沙等地设有发行所；在青岛、天津、济南、镇江、蚌埠等地设有分销处或联运站，从北到南，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一条条吸血管布满全国，吮吸着同胞们的鲜血。方液仙的资产象滚雪球似的，从四十万元滚到五百万元之巨，成了全国声势赫赫的日用化学工业垄断巨头之一。

但是，骗局不能长久，鬼把戏总会败露。方液仙的卑劣行径，瞒不过工人们雪亮的眼睛。有一天，几个工人和往常一样把印有“U. S. A.”字样的除虫菊包打开，发现里面有几张商标模样的小纸，上面印“北海道”等日本地名。这下，方液仙“抗日”的假面具立即给揭开了，“爱国”是假，卖国是真；“抵制”是假，赚钱是真。方液仙勾结日寇冒充国货，大发国难财的消息顷刻间传遍了全厂，工人们怒不可遏，满腔的阶级仇、民族恨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资本家眼看阴谋败露，慌了手脚，一面推说不知此事，一面装模作样地给美国拍电报，表示“抗议”。真是吸血鬼擦粉，欲盖弥彰。资本家的无耻诡辩，更激起了工人們的无比愤慨，撕碎了的日本商标象雪花似的满地飞。

“打倒卖国贼！”“打倒汉奸！”

口号声震荡了全厂，一场斗争，象烈火般地迅速蔓延开了……

纸厂烈火

一八九〇年，大卖国贼李鸿章趁搞“洋务运动”之际，在上海开了两厂造纸厂，一厂在浦西杨树浦，叫天章造纸厂“西厂”（即现在的先锋造纸厂）；一厂在浦东陆家嘴，叫天章造纸厂“东厂”（即现在的利华造纸厂）。天章造纸厂是我国最早用机器造纸的工厂。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鬼子占领了天章造纸厂。一九四三年，在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在各个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全国抗日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日寇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由于庞大的军费开支，使日本国内通货膨胀，市场萧条，粮食奇缺，引起了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为了挽救败局、摆脱危机，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把危机转嫁给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日本劳动人民；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想把祸水引到中国人民身上。为了达到这一罪恶目的，日寇在沦陷区大肆滥发钞票，疯狂地加紧经济掠夺。这年秋天，就决定在浦东天章造纸厂生产钞票纸。

日本厂长藤本接到任务后，马上叫人把厂里所有的鬼子召集来，下了两条命令：第一，严密监视，用武力把工人“捆”在机器上干活，失职者严加惩办；第二，谁也不许泄露造钞票纸的事，泄露者立即枪毙。

一个胖得象条肥猪似的日本鬼子，跨上一步走到藤本面

前，立得毕恭毕正，谄媚地回答说：“明白，誓为帝国效劳。”这人叫松本，是造纸间的工头，也是藤本忠实的心腹。这家伙凶残暴戾，一贯欺压工人，厂里没有一个工人不恨他。

第二天清早，一卡车日本宪兵气势汹汹地开进厂里。这些鬼子宪兵腰挎手枪，手执皮鞭，横冲直撞地闯进了车间，恶狠狠地监视着工人。紧接着一卡车的麻、棉花等造钞票纸的原料运进了厂。

富有斗争经验的纸厂工人们心里都在暗暗地琢磨着：日本鬼子又在搞啥鬼名堂了！

趁鬼子离开车间的时候，造纸间的工人们悄悄地议论起来。

“卡车运进来那么多的麻和棉花，我看呀，鬼子又想造什么纸了！”

“这还用说，一定是造钞票纸。”一个高个子工人肯定地说：“麻、棉花都是造钞票纸的原料，鬼子又派了这么多宪兵来监视我们，不是为了造钞票纸，那才有鬼哩！”

工人们觉得这话在理。鬼子要造钞票纸，激起大家满腔怒火。工人们清楚地记得，“八·一三”日本鬼子侵占上海，浦东天章纸厂成了鬼子的司令部。鬼子一次就在这里杀害了三、四百个中国同胞，尸体填满了坑坑沟沟，鲜血浸透了寸寸土地！……现在鬼子又要在这里造钞票纸，疯狂地喝中国人民的血，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决不能答应！大家悲愤地回忆着日寇的血腥暴行，一个工人气愤地说：“我们不能造这种纸！”

“对，不能造！我们要一个心眼跟鬼子斗，使钞票纸造不出来！用实际行动来支援解放区。”高个子工人握紧拳头说。

造纸间的工人经过商量，分头到各个车间去串联。接着

开始了拒造钞票纸的斗争。

造纸间的工人们开着空车，马达轰轰响，大家却躺在墙角打瞌睡。一个工人在门外望风。鬼子来了，望风的工人吹了声口哨，大家又装着干活，等鬼子一走，人们又把空车开得隆隆响。有的工人故意把造纸机的铜网扯几条豁口，造出来的纸都成了废品，鬼子见着不得不哇哇地喊停车，叫铜匠间工人来修理。机修工人故意磨磨蹭蹭地一修就得大半天。制浆间的工人趁鬼子不在车间时，把闸门一拔，白花花的纸浆涌进了阴沟，流向黄浦江……

工人们的斗争，卡住了日寇生产钞票纸的咽喉，眼看纸张生产一天比一天少，鬼子松本却急得查不出啥原因。

藤本把松本叫到办公室问道：

“你给我统计一下，现在钞票纸到底造出来多少了？”

松本支支吾吾地说：“不，不知什么缘故，现在纸张产量急剧下降，只完成了计划的十分之一。”

“什么，十分之一？”藤本咬牙切齿地说，“哼，一定是这些穷工人在捣鬼！”

松本哭丧着脸，“我把所有的宪兵都派去监视了，没有发现工人捣鬼。”

“笨蛋！”藤本捶着桌子暴跳如雷，臭骂道：“这些工人难道会在你的眼皮下搞花样？”藤本露出了一副狰狞面目，杀气腾腾地咆哮着：“去！快去！快爬到屋顶上去，悄悄地从屋上面监视他们。如果看见谁磨洋工，你就抓几个来，我要杀一儆百！”

松本离开了写字间，操起一根木棍，立即爬上屋顶，偷偷地从天窗上往造纸间里望着……



车间里，高个子和几个工人用刀子铜网上划了两道口子。这样，纸浆经过铜网，烘干成的纸都露出了二道长长的窟窿。松本奸笑一声，恶狠狠地自言自语：“喔！原来是他。”松本滚下了屋顶，报告了藤本，藤本立即亲自带了几个宪兵，冲进造纸间，把高个子工人和另外三个工人抓走了。

工人们一团团怒火从胸中迸发出来：“为什么抓我们工人！”

这时一个络腮胡子的工人握紧拳头：“抓人吓不倒我们，只要有一个人活着，我们就要跟鬼子斗到底！鬼子现在耍了新花招，我们就要给鬼子新的打击！”这个工人轻轻地向大伙嘀咕了一阵，然后大伙点了点头，赞同道：“好！就这么办！”

松本自从把四个工人逮捕以后，十分得意，他以为这样一来，工人们就会乖乖地听他的指挥，钞票纸就会源源不断地出厂。这天，他喝得醉醺醺的，拿着木棍又攀上屋顶，忽然看见一个工人坐在屋顶上抽烟。纸厂是最怕烟火的，松本一见气红了眼，鬼叫似地喊了一声，那工人根本不睬他，松本挥着木棍冲去，那个工人见松本扑了过来，站起来慢慢地向纸浆车间的屋顶走去。松本一面骂，一面紧追不放，当他刚刚走到纸浆间屋顶时，一脚踏到工人预先虚设好的石棉板上，“咔嚓”一声，石棉板翻了身，松本从半空中，重重地摔了下来，脑袋撞在地上的一块铁板上，顿时脑浆飞溅，就此完蛋。

松本摔死的消息传来，全厂工人无不拍手称快。

可是，藤本却象被挖去了一块心头肉，疼极了！他在听到这个消息前，正在盘算着怎样提拔松本，这会儿他的两条腿一软，“咕咚”一声跌倒在沙发上，半天爬不起来。他想这几天司令部在电话里大骂他“饭桶”，警告他要是再交不出钞票纸，就

要他的脑袋。印刷厂的鬼子也说，要是纸张供应不上，机器停下来，就要他负全部的责任，……。藤本两眼死死地盯着天花板，脑子里不停地转动，忽然，他狞笑一声，把狗眼一转，想出了一条恶毒的主意。

藤本马上叫鬼子宪兵把四个逮捕的工人带进了写字间，他脸上堆着奸笑，叫宪兵给高个子工人松了绑绳，捧出一大迭钞票放在四个工人面前，说：

“金票的给，你们的帮帮忙，小意思！只要你们劝工人好好地干活，我的金票大大的有！”

四个工人巍然屹立，谁也不睬他。

藤本厚着脸皮又问：“好吗？唔？……”

高个子工人昂起头，哈哈地大笑起来：“我也只有一个条件。”

藤本点了点头哈着腰问：“你说，我一定尽力而为……只要工人好好干活，好好干活……”

高个子工人粗胳膊一挥，大声地说：“不准你们造钞票纸！”

这当头一棒，使藤本恼羞成怒，露出了刽子手的狰狞面目，暴跳着：“混蛋，你大大地坏，我今天要给你点颜色看看，来人，给我打，狠狠地打！”

鬼子宪兵挥动着皮鞭，皮鞭在空中呼啸象雨点一样落在四个工人身上。“说，是谁指使你们的？……谁是共产党？……”一阵阵疯狂的呼喊。

四个工人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把藤本痛骂了一顿。鬼子宪兵把他们打昏了过去，又用冷水冲醒。

“只要你们叫工人好好地干活，就放掉你们……”

回答的仍然是一阵痛骂。

藤本眼覓“希望”破灭了，便叫宪兵把这四个工人悄悄地拖到木工部附近的荒地里，前面是一个挖得很深的坑。藤本不放过最后一丝“希望”，他指着坑威胁道：“说，给你们最后一分钟……”

四个工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光，眼里充满了必胜的信念，高个子工人带头喊起了口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激昂的口号声在天空久久地回荡着……。

四个工人被害的消息传到了工人中间后，就象一根火柴点燃了一堆纸，燃烧起一场熊熊烈火。

这时，全国的抗日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在解放区战场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尽管日寇把消息封锁得很紧，但是胜利的消息还是不断地传到了纸厂。造纸间的工人们串联了纸浆间、铜匠间的工人，经过反复商量研究，决定配合全国形势，以四个工人被杀害为导火线，举行一次罢工。拒造钞票纸，打击日本侵略者。

造纸间的工人首先关了车。接着，纸浆间、铜匠间的工人也罢工了，各车间罢工工人立即汇成了一股巨浪，浩浩荡荡地向写字间涌去，把写字间团团地围了起来。

“不许藤本杀害我们同胞！”

“打倒刽子手藤本！”

怒吼声象大海的波涛一样，把写字间的玻璃窗震得嗡嗡作响。

藤本见此情景，吓得两腿发抖，“啪”地一下把门关得紧紧的，窗子也关得严严的。几个鬼子宪兵躲在角落里缩成一团。藤本躲在台子底下，慌慌张张地给司令部打了个电话。司令部答应马上调海军陆战队来镇压。

窗外，愤怒的工人举起了几百只拳头。

“砸！”石子、碎砖头冰雹似地飞到窗子上，玻璃窗被砸得粉碎。

几个工人找来一条大板凳对准写字间的大门，猛力撞过去。

“轰”地一声，门被撞开了。

工人们拥进了写字间。揪住藤本，把鬼子团团围住。

藤本想要无赖，一个工人狠狠地给了他一拳。

从卡车喇叭的怪叫声，知道是增援的鬼子兵来了。这时，卡车闯进了工厂的大门。鬼子兵端着刺刀，把工人围住，一个军官模样的鬼子操着蹩脚的中国话喊道：“出来，干活的，皇军不问罪，不出来，罢工的，抓起来，死拉死拉！”

“大家团结起来，不要怕，他们有枪，我们有拳头！”

“把藤本推到前头去，鬼子要开枪，我们先打死他！”

一个工人揪住藤本，把他推到前面。藤本吓得面如土色，两腿筛糠。

鬼子军官怪叫两声，举着指挥刀在空中挥了几下，鬼子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向写字间拥来……

这时，在写字间里，四五个工人揪住藤本。一个工人手拿着一把十二寸的大扳头，对准藤本的脑袋，声色俱厉的说：“藤本，只要鬼子开枪打伤我们一个工人，我就砸烂你的脑袋！”

藤本原想依靠武力来镇压罢工，想不到不但没有吓倒英

勇的纸厂工人，反而激起了工人更大的反抗，如再不撤兵，恐怕连自己的狗命都难保。于是藤本在工人的挟押下，战战兢兢的走到窗前，喊道：“快撤兵……快撤兵！”

鬼子兵一个个拖着枪，拐着腿，在工人的怒吼声中，夹着尾巴滚出了浦东天章纸厂……

霹雳在天空爆炸，反抗斗争的烈火冲天燃烧。浦东天章纸厂的工人的罢工斗争得到了全市印刷工人和运输工人的支持，大家都宣告罢工。最后，日寇不得不在浦东天章纸厂停止钞票纸的生产。

拒造“鬼子车”

上海自行车厂，是一家生产“永久牌”自行车的专业工厂，前身叫昌和制作所。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上海自行车厂的面貌焕然一新。与解放初期相比，厂房面积扩大了近五倍，职工人数增加了十几倍，自行车产量提高了近四百倍，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提高了一倍以上。自行车的品种，也由原来的单一品种，发展为平车、轻便车、载重车、赛车、两用车，共五大类十九个品种。质量不断提高。

解放前自行车，叫“洋驴子”。旧中国在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连一辆普通的自行车也造不出，大街上行走的都是些“兰苓”、“三枪”等“洋驴子”。当时，洋鬼子荷枪实弹，践踏祖国的锦绣河山，吮吸中国人民的血汗，强行推销他们的“洋驴子”。车轮滚处，一条条狭长的车辙，犹如中国人民受奴役、受压迫的条条鞭痕；累累车印，深深地印下了中国人民的满腔阶级仇、民族恨。

一九四〇年，日本商人小岛和三郎来到上海开设了一家自行车厂，妄想利用中国的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小岛从日本弄来一些破旧的机器设备，在提篮桥附近强占了一块土地，雇用了十几个中国人，逼迫他

们修房子、开模子，一年半后开设了昌和制作所，和一个附属门市部——昌和洋行。当时昌和制作所生产的是“铁锚牌”军用自行车，专门供应日本侵略军用来屠杀中国人民，工人们都憎恶地称之为“鬼子车”。

日本老板为了制造更多的杀人工具，使用最野蛮的手段强迫工人整天象奴隶一样地劳动。每天一早，太阳还没出来，工人们就在厂门口排好队，和犯人一样由日本工头点名进厂，一直干到星星月亮出来，才拖着疲累不堪的身子走出厂门。日本老板常常强迫工人延长劳动时间，有时工人累得实在吃不消，不肯加班，日本工头就把厂门一关，架起机关枪，逼迫他们没死没活地干。

日本老板要的只是“鬼子车”，对工人的死活根本不管。生产条件极为恶劣，皮带盘交错得象蜘蛛网，轧掉手、砸坏脚的事经常发生。不管是严冬还是酷暑，酸洗工人成年光着手，在腐蚀性很强的药水里工作，没多久皮肉都烂透了。电镀车间有个工人的一双手到现在还捏不拢拳，一到冬天就要开裂出血。更凄惨的是，有一次，一个工人加料，突然药水沸腾起来，一下子溅满了这个工人的全身，没多久就活活地疼死了。日本老板只心痛自己的一槽药水，而对中国工人的死活却全然不管。

还有一个工人，被日本工头追打时，给马达皮带卷了进去，整个身体随着天轴直打转，等工友发现连忙关了电门把他救下来时，已满身是血，不到两个钟头便断了气。日本工头只当没回事，哼了两声就大摇大摆地走出了车间，工人们实在气愤不过，就找老板算帐，在广大工人的斗争下，日本老板才不得不给了安葬费，而那个打人凶手却依然逍遥法外。黑色的“鬼子车”每个零件都浸透了中国工人的血和泪啊！

更令人气愤的是，日本鬼子将中国工人当作亡国奴，任意侮辱殴打，甚至置于死地。昌和制作所的大门口有一个弯弯曲曲的过道，这叫“抄身弄”，工人每天进出厂门，都要象犯人一样被日本领班抄身。如果从工人身上发现一点做活时飞进衣服里的铜屑，就被诬蔑为偷了老板的东西，就要遭一顿毒打。当时厂内有一棵“吊人树”，专门吊打无辜的中国工人，有次，一个工人因买不起饭盒，在废铁堆里拣了一块废铁皮，打算用它来做饭盒，抄身时鬼子发现了，马上被绑在“吊人树”上，大小领班轮流用棍子打，鞭子抽，打昏了用冷水浇，浇醒了再打，打得他血肉模糊，在树上吊了一夜。

然而，中国工人不可侮，日本鬼子的种种暴行激起了中国工人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工人们不断举行罢工与日本老板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声势最大的一次，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昌和制作所的工人进行了一次拒造“鬼子车”的斗争。

一天，日本老板小岛接到日本陆军司令部的密电，命令昌和制作所火速赶制一批军用自行车，送往前线。小岛接到命令后，非常着急，感到这批军车非同小可。他便立即召集大小喽罗，布置任务，决定强迫工人加班加点将这批军车赶造出来。

工人们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认识到，敌占区人民必须积极配合八路军、新四军，狠狠打击日寇，争取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我们决不能为日本鬼子制造杀人工具。如果我们拒造这批“鬼子车”，就能够既打击了日本鬼子，又支援了解放区，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因此，工人们决定举行罢工，以要求改善生活，增加工资为由，拒造“鬼子车”。

车间里，工人们三五成群地正在商量如何坚持罢工，使这

批“鬼子车”造不出来，忽然看见从来不到车间来的小岛也跑进车间来东张西望，工人们立即意识到日本老板又要什么鬼花招，大家就坐在原地冷冷地看着他。

小岛看到工人都一个个地怒目瞪视着他，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心想这些穷工人越来越难弄了，但又想到陆军司令部的密电，只好硬着头皮开了腔：“中国工友们！最近接到一批重要任务，时间大大的紧，望中国工友能以大局为重，与我们携手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之重任。”说完满脸堆笑，慢慢地向前跨了两步，等待工人们的回答。可是等了好久，还不见一个人回答，空气死般地沉闷，小岛正要开口，忽然坐在他旁边机器上的一个青年慢慢地举起双手，拉长声音，懒懒地打了个哈欠。小岛眉头一皱，刚想发作，远处一个年纪大点的工人突然大声地干咳起来，有的工人干脆眯起双眼闭目养神。小岛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苦笑了一下。站在他旁边的矮个子领班实在急得发慌，跑上前对工人大声嚷道：“小岛先生在问你们话，你们为什么不回答？”

“滚出去，走狗！”工人们齐声怒吼。

矮个子领班赶紧缩回头，躲到小岛身后，小岛也吓得连连后退，忙掏出手帕擦拭头上的黄汗。小岛知道再待在这里，自己可能也难免要挨打，连忙退到车间门口说：“这样吧，我愿以热忱之心，等待诸位的好消息。我希望今天能听到机器转动的声音。”说完头也不回地溜出了车间，身后传来一阵阵工人的哄笑声。

小岛坐在办公室里一直焦急地等着，还不时侧起他的狗耳朵听听车间里有没有机器声。他等啊，听啊，但厂里仍然是一片寂静，他想这样下去不行，得想办法叫工人复工。小岛最



后决定暗中破坏，他连忙派人去巡捕房请来一个“包打听”，送给这个家伙一辆“铁锚牌”自行车，叫他去工人中间游说，诱骗工人复工。

这个“包打听”跑进车间，对工人说：“工友们，你们辛苦了，鄙人是一个中国人，对中国工人的苦难生活深表同情……”这家伙唾沫四溅，正说得起劲，忽然一个工人打断了他的话：

“你少噜苏！是小岛叫你来的吗？”

“啊，不不不！本人也很想与诸位工友见见面。”“包打听”连忙申诉。“我愿为本国工友效劳，只要大家复工，各项条件都可包在兄弟身上！”

“中国人民决不当亡国奴！”

“滚出去，无赖！”

工人们齐声怒吼，有个工人抓起铁棍就要打他，“包打听”吓得连滚带爬地跑出了车间。

小岛听了“包打听”的汇报后，又气又急，造不出车子，上边不好交代。小岛坐在沙发里苦思着，又想出了一个鬼点子。铁青的脸上慢慢地露出了一丝杀机和几分狞笑……

老奸巨滑的小岛终于露出了豺狼本性，他拎起电话机，就叫陆军司令部马上派兵来厂。他又将厂内大小喽罗一齐召来，宣布今天晚上全厂加班，天一亮就交出一批军车。并威胁说天亮前交不出车子，就作违抗军令论处，有谁闹事就送陆军司令部严厉惩办。

顿时乌云笼罩了全厂，两道铁门“嘭”的一声紧紧关闭起来，厂房四周全部拉起了铁丝网，警车嘶鸣，日本陆军司令部派来的兵，头戴钢盔，杀气腾腾，在厂门口架起了机关枪。小

岛见一切都安排好了，心想这下总要开工了吧！便挺着肥大的肚子，跑进办公室，又陷进沙发里等着工人们复工的消息。

车间里工人们分成了好几个小组在商量。有的手里拿着自行车管子，有的手里拿着自行车牙轮，有的拿着木棍，不知是谁又从车间外边搬来了许多大石块。一个工人说：“日本鬼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我们不要被他们的凶相所吓倒。”一个中年工人说：“我们一定坚持斗争，配合抗日战争的大反攻，彻底打败日本鬼子！”说完，这个中年工人扬了扬手中的铁棍。

“对，一定要坚持斗争，迎接胜利！”

工人们激动地议论着。群情振奋。

时间飞快地过去，厂里还是那么寂静。小岛从沙发中爬起来，又一次看了看手表，已经是子夜时分了，但厂里除了寂静还是寂静。

这时车间里却不平静，大家经过商量，决定天亮后如果小岛抓人，就揪住他上街示众。大家越谈越有劲。工人们望着远处阴森森的办公室大楼里亮着淡黄的灯光，知道小岛这条老狐狸还没离厂，大家低声说道：“等着吧！小岛，和你算总帐的日子就要到了……”

天渐渐亮了，一个不平静的早晨，冲破了长夜的黑暗终于来到了。黎明的曙光映照着工人们一张张兴奋的脸庞，“天亮了，做好准备！”大家互相提醒着。

小岛干等了一夜，两眼血红，呲牙咧嘴，活象一条困极了的饿狼，暴跳如雷，大喊大叫，昔日的一副“文明”相，早已抛得精光。他袖子一卷，带着大小领班急匆匆地向车间跑去。车间里工人手握铁管棍棒严阵以待，小岛上前正想抓人，一见愤怒

的人群，缩着身子就往后逃。工人们象潮水般冲了上来，一把揪住这个家伙，众人喊打。头带钢盔的日本陆军，想开枪射击，又怕伤着小岛，见群众越来越多，赶紧收起刺刀，扛起机枪，往厂外撤，连那条平时昂首摇尾的大狼狗也似乎感到情况不妙，垂着头跟在主子后面夹着尾巴向外拚命逃。

在工人们的英勇斗争下，日本老板小岛只得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日本陆军司令部要的这批军车，也未能如期造出。拒造“鬼子车”的斗争，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日战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凶焰。拒造“鬼子车”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人们激动地高呼口号。工人们望着初升的朝阳，感到浑身力量无穷，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迎接新的更加艰巨的战斗……。

帝国主义的“害华公司”

上海制皂厂，解放前是英商“利华肥皂公司”。

早在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世界时，英帝打着“有利中华”的旗号，凭借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挂起了这块骗人的招牌。开始，帝国主义分子只在苏州河畔经销“祥茂”、“绍昌”、“日光”等进口皂及兼销“白礼氏”洋蜡烛。但是，他们并不因此就满足，到了一九二四年又投资几万银元，在杨树浦沿江地带野蛮强占了八十亩土地，办起肥皂厂。起初只用五个炉子，一个烟囱，二十只煮皂锅等设备。开始了他们迫害中国人民的生涯，写起剥削中国人民的罪恶历史。继后，他们不断大兴厂业。一九二九年，又相继增建了木箱车间，印刷车间和甘油车间；由原来五个炉子、一个烟囱，骤增到十个炉子、两个烟囱，肥皂年产量达一百八十三万箱，比建厂初期多了一倍。一九三一年，又增加香皂车间，自制“力士”香皂，并雇佣一批人在剧场、影院、车站等公共场所大做广告，用“中奖”、“赠品”、“低价出售”等手法欺骗顾客，以打开肥皂销路；一旦销路打开，他们就耍卑鄙手段，先是压缩销售量，造成市场供应紧张，然后再抬高售价。他们还在我国农村购买了大量廉价原料，经加工制成产品后，高价出售。他们还从伦敦总公司调拨大批成本极低的原料进口中国，以高价转卖给其他厂商，捞取暴利；同时把本厂的粗甘油转运英国精炼后，再运进我国，从中攫取巨额利润。

这还不算，他们甚至偷工减料故意缩减肥皂中脂肪酸的比例，将洗衣皂中的香料掺杂到香皂中，以次充好，增加剥削。为提供制皂油源，一九三九年又建造榨油厂和白脱油车间。同时，英帝又在我国四十多个大中城市中，设立了“利华”公司分销处和代办处，利用这些据点一方面大量推销产品；每年从中国人民身上搜刮去千百万银元，仅一九四一年前三个季度的利润，就达几百万元，等于“利华”公司全部投资的几倍。英商“利华”肥皂公司完全是在吮吸中国劳动人民血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这块“利华”招牌背后，滚进英国老板钱袋里的百万财富中的每一厘钱，渗透着多少工人的血和汗。

仇恨的种子

“利华”公司开办时，只有三百多工人。这些从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农村逃荒到上海来的贫苦农民，刚离开了地主阶级残酷压榨的虎口，又跌进了帝国主义疯狂剥削的狼窝。他们没日没夜地为英国资本家流血流汗。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使工人们如牛马一般在最低的生活水准上煎熬着，挣扎着。一个男工每天累死累活地卖命，换来的却只能买点仅供本人填饥的“六谷粉”。女工的遭遇就更惨了。她们虽然和男工一样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每天所得只有男工工资的一半。很多女工从怀孕到快要生孩子时，都得瞒着英国领班，千方百计躲避监工。因为一旦被这些家伙觉察就要遭到开除。有个女工，即将生育时，因为无钱送礼，工头不准她的假，只得继续上班。一个冬天的早晨，寒风刺骨，她走出家门就觉得肚子阵阵绞痛，刚走到仁忻街弄堂口，身子直抖晃，她知道要临

产了，想支撑着赶回家去。但疼痛使她直不起腰，迈不开步，便双手扶着肚子疼倒在路上，黄豆般大的汗珠从脸上冒了出来，冻得发紫的嘴唇颤抖着……。“哇！”婴儿伴随着寒冷和饥饿，诞生在这吃人的社会，来到了黑暗的人间，恰巧这时有几个上班的姐妹发现，才把她和孩子送回了家。这个女工也就这样被踢出了工厂。为了使孩子永远不忘阶级仇，牢记民族恨，妈妈给孩子起名叫“路路”。还有多少工人为了挣这一天的糊口钱，正当生长发育的孩子时期，就进了“利华”厂，出卖劳动力了。老工人王洪宽，十二岁起进了厂，在靠黄浦江的炼油车间工作，被吃人的帝国主义夺去了一条手臂。那是一九三九年三月的一天，王师傅刚走进车间，工头就催促着王师傅到搅拌机上挖出油渣，赶快开车。搅拌机里隔天留下的油渣，经过一夜江风吹干后，象石块一样坚硬。可恶的工头，逼着王师傅用手去挖油渣，并威胁说：“不挖就停生意。”王师傅把手伸进搅拌机，好不容易挖完了第一畚箕，已汗流浹背，手指全起了血泡。当王师傅再次把手伸进搅拌机时，工头为了抓紧时间生产，不问情由，就开动了搅拌机扬长而去。说时迟，那时快，搅拌机飞快地转动了，一眨眼，把王师傅的一条手臂轧住了，卷进机翼中。顿时，殷红的鲜血从断臂处喷射到油渣上，把黑色的油渣染成了红色。王师傅只觉得眼前一团漆黑，当即昏倒在机旁。鲜血在不停地流着，搅拌机仍然在无情地旋转着，把王师傅的一条手臂搅成了肉酱。当王师傅被江风吹醒时，他忍受着极大的疼痛，沿着梯子艰难地一步一步往下爬，由于支撑不住，最后从梯子上滚了下来。四周的工人闻讯赶来，立即把昏迷了的王师傅抬到了英国大班的写字间。可是，心毒如砒霜的帝国主义分子“哈巴”，开口的第一句话不是

问人的伤势如何，而是问：“机器坏了没有？”在场的工人们一听怒火顿时从心中燃起，责问“哈巴”，难道我们工人不是人？！还有没有人身保障？！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问得英帝国主义分子哑口无言，被迫同意支付医药费，把王师傅送进了医院。鲜血洒滴在通向医院的路上，滴滴鲜血化成了阶级仇、民族恨的火种，深深地埋进了工人们的心田里。

罪恶的“利华”公司不仅夺去了王师傅的一条手臂，还夺走了中国工人的无数条生命。英国资本家只顾加紧剥削，增加利润，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机器年久失修，没有安全保障，残酷的阶级剥削，使工伤事故不断出现，时刻威胁着工人的生命。

煮皂车间是当时生产的心脏部门，英国资本家把煮皂的过程和技术资料，对工人实行严密控制。在这个二层楼上的车间里，分两排布满了二十只煮皂锅。每只皂锅可容纳四十吨皂液。锅内油脂和烧碱溶化煮皂时，温度达摄氏一百多度。整个车间四周没有一扇窗子，室内温度高达摄氏五十度，恰似一个大蒸笼。工人们干活时，上身赤膊，下身裹一块破麻布，脚上穿一双木拖鞋，滚烫的皂液溅到身上就起一个水泡。可是这个车间的英国领班法莱巧（工人们叫他“坏来西”）和工头杨隐渔经常到这个车间，还虎视眈眈地监视着工人。一天早上，工头硬逼着工人夏三，到还有齐腰深的滚热油脂的壹号煮皂锅去铲除结在锅壁上的皂脚。但是不采用任何安全保险的措施，这时，锅内的热油旋旋翻滚，热气腾腾上升。夏三就穿着木拖鞋，顺着放皂液的莲蓬头上的铁链条下去，艰难地铲除着。一个多小时下来，累得他精疲力尽，满身汗珠象雨一样地往下淌，锅内升腾的热气在弥漫着，根本看不清下路的方向，

脚上的木拖鞋一滑，“呼”地一声，夏三连鞋带人一起掉进了锅中……。工人们立刻飞奔到楼下，关掉了总水汀。匆匆地搬来了竹梯放入锅中，进行抢救。这时，夏三的下身全部淹没在热油里，双手高举出油面，艰难地挣扎着。工人们沿着梯子一步一步地下去，伸出阶级兄弟的友谊之手，把昏迷的夏三拉出来后，简直目不忍睹，已经不象一个人了。整个上身布满了烫伤后的水泡，显露出红嫩的鲜肉；油和汗粘结在一起，往下淋漓；皮大块大块地脱落下来，有的悬在身上抖摇着；两条大腿已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工人们一面紧急地把不省人事的夏三往医院里送，同时派几位代表到英国佬写字间，找法莱巧立即支付医药费抢救夏三。

法莱巧早已得到了洋奴的报告，没等工人开口，就劈头盖脑地问：“谁叫你们关总水汀的？停产了你们要负责？”工人们听了这话，怎能按捺得住心头的愤恨，一声接一声地斥责道：“夏三掉入锅中，人都快死啦！”“不关水汀怎么救人！”怒声迸发，一声高一声，淹没了法莱巧的叫嚣。英国佬一向认为中国人可以任意宰割，万万没想到工人如此齐心，如此胆大。只得转换上一副阴险的笑脸，说医药费可以商量支付，要工人们赶快回车间生产。工人们刚走出写字间，从医院回来的工人，带来了夏三到医院不久就死去的消息。消息撕裂了工人们悲愤的心，点燃了埋在工人们心田里的火种。肥皂，虽然能洗去油污，但永远洗不掉罪恶的“利华”公司留在工人身上的斑斑伤痕。工人们紧握双拳，义愤填膺，怒视着英国佬的写字间愤愤地说：“总有一天，要找你们算帐！阶级的深仇一定要报！”

日寇的“军事工厂”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日寇的“海军陆战队”也就进驻了上海租界，“利华”肥皂公司厂门口英帝国主义的“米字旗”换上了日本鬼子的“太阳旗”。从门岗警卫到车间工头都换上了日本人，实行了军事控制。真是前门走了虎，后门又进了狼。英国老板心狠手辣吃人不吐骨，日本强盗蛇蝎之心杀人不眨眼。他们都是凶残的吸血鬼，狠毒的刽子手。日本鬼子不仅全部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的一整套剥削方法，而且变本加厉，采取更加野蛮更加毒辣的手段，对工人实行更加残酷的剥削。从此，工人们又陷入了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下。

日寇为了加紧掠夺，每个车间都派上两个日本人监工，强迫工人每天从事九至十二小时的劳动。不能休息，不能走动。不仅如此，他们还豢养了一批汉奸走狗，为他们效劳，监视工人行动。原来在英国老板手下的工头杨隐渔，摇身一变，又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这个民族败类积极为他的主子出谋献策。为讨好日本人，他勾结了厂外的地痞、流氓，组织起一个专门为日本人招收廉价劳动力的所谓“大陆公司”。使日本鬼子可以随意解雇和开除工人。成了淡季减人有后路，旺季增人有来源的交易所。在“大陆公司”的魔爪下，肥皂厂工人每年平均有一百多工人失业，一些工人三进三出，甚至五进五出肥皂厂。工人得到的相当微薄的工资，还得被“大陆公司”榨去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剥削榨干了工人们的血汗，夺走了工

人们辛勤劳动出来的果实。一箱一箱的肥皂装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车，运出了中国的国土。为了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帝国主义又将原来生产的民用皂全部改为生产军用皂，运往前线。并且，从日本运来了大量的固体泡化碱。泡化碱是一种非常容易凝固的化合物，先要放在炉内熔化后，才能制肥皂。熔化泡化碱的炉子高达二、三十米，宽仅一米半。要敲碎凝固的泡化碱，日本监工逼着工人用绳子吊着身子到炉内干活。炉身高，炉体窄，炉膛里闷热得连气也喘不过来，每天劳动九到十二小时，身子弯成弓一样。工人们用汗水一点一滴地溶化着这硬块，有多少阶级兄弟昏倒在炉内；同时，日寇还不断增加制造枪炮弹药所必需的军工原料——甘油的生产，这样，“利华”公司，就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战养战”的“军工厂”。

赶走侵略者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帝国主义的残酷迫害，从反面教育了工人；要摆脱这人间地狱的生活，只有一条路——斗争！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越残酷，工人们的反抗斗争越坚强。自从“利华”公司开办以来，工人们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最大的一次斗争是在一九三九年七月，肥皂厂的工人们不甘心英帝的重重压榨，团结一致举行了声势十分浩大的罢工斗争，在兄弟厂工人的支持和声援下，罢工整整坚持了两个星期。迫使英国老板无条件接受了工人提出的要求，取得了斗争胜利。曾经同英帝进行过英勇斗争的肥皂厂工人，对于日本强盗的残酷剥削

和血腥镇压也没有屈服。开除吓不倒工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厂工人采取了更加隐蔽和巧妙的办法，同日寇展开了斗争。甘油车间的工人们为了打乱敌人侵略计划，堵塞通向它的侵略战场的资源，在进行甘油蒸发时，掺进大量的水份，把提炼甘油变成蒸发水份。他们避开了监工的严密盯视，坚持扰乱生产的对敌斗争。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飞机经常轰炸上海，工厂也多次遭到袭击。每当美机来轰炸时，工人们就故意扔下开动着的机器，全体离开厂房，使大量的甘油、肥皂液喷出锅外，流得遍地都是，一条条肥皂被机器甩得满地狼藉。日本鬼子用刀枪拦不住拥出车间的工人。鬼子大班、二班和监工们大嚷着：“你们照常生产，一天给三天的工钱。”妄想用金钱来诱骗工人生产。但敌人得到的回答是被踩污了的肥皂块，满地的甘油和发出怪叫的机器声。

一九四四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战场上节节溃败。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越战越强，极大地鼓舞了沦陷区的人民。肥皂厂工人眼看日本法西斯强盗面临崩溃的命运，抗日情绪不断高涨，反抗斗争日益频繁。一次，一个日本工头在厂门口地上发现了一块肥皂，就污蔑是工人偷的，强迫已下班要出厂的四十多个工人全部跪在地上，不准出厂。中国人民哪能甘心忍受鬼子的如此欺侮，坚决不跪，并拿起手中的“工号牌”，一起向鬼子头上掷去，愤怒地高喊：“我们不干了！”一直被视为“生死牌”的“工号牌”，已起不了任何作用。鬼子被工人们愤怒声势吓得目瞪口呆，只好把“工号牌”从地上拣起，乖乖地送回给工人，放大家出厂。这年秋天，日本鬼子又无故解雇了八名女工。消息传开后，全厂工人更坚决反抗，群起声援，纷纷拥向日本大班泰黑一先的写字间，提出强烈抗议：“不

准无故解雇工人！”大家深深懂得，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能赢得胜利。在党组织的有计划部署下，开始了罢工斗争，生产完全处于瘫痪。关系着日寇军需的甘油原料断产，急得鬼子跺脚不停，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要求。罢工的胜利，进一步增强了全厂工人的革命斗志。

一九四五年，当中国人民即将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的时候，厂里的日本强盗预感到自己末日来临，妄想作垂死挣扎，要把厂里的甘油、肥皂等财产抢劫走。工人们得此消息后，非常气愤。立即分头布置、准备，决心为保卫劳动果实同鬼子大干一场。那一天，“海军陆战队”开来了三十多辆卡车，每辆车上都载有两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气势汹汹地闯进厂来。早已作好准备的工人们，见车子进厂后，一下子拥了上去，手挽手地切断了他们的去路，把敌人团团围住，不准他们移动一步。顿时几个鬼子跳下卡车，拔出了腰中的刺刀向工人们挥舞过来，妄想就此把工人们吓退。可是，团结起来的工人是劈不开，吓不散的，工人高根荣一个箭步跳上前去与鬼子厮打了起来。在夺刀时被鬼子的刺刀刺穿了手掌，一股鲜血直冒出来。血！阶级兄弟的血，染红了身上的衣服，更激起了工人们的万丈怒火。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四周手无寸铁的工人们用石块、瓦片当武器，冲上前去同日本鬼子展开了殊死的搏斗。石块、瓦片打得敌人狼狈不堪，只得夹着尾巴仓皇地逃出了厂。工人们胜利地保卫了工厂，保住了劳动果实。

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暴统治。抗战胜利的喜讯传到了肥皂厂，工人们个个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工人撕下了厂门口的“太阳旗”，

把鬼子的写字间包围得水泄不通。“讨还血债！”“赶走侵略者！”呼声震天动地。龟缩在写字间里的大班、二班，如坐针毡，不知所措。最后，这些强盗不得不爬出来，在工人们一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怒口号声中，滚出了肥皂厂。

包围“老晋隆”

同志，每当你戴上银光闪闪的上海牌手表时，你可曾想到这小小的手表，凝结着我们手表工人多少深情厚意！

手表工业是我国的新兴工业。上海手表厂是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的产物。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手表厂的广大革命职工，发扬了工人是工厂主人的精神，十几年来，手表生产大幅度上升，质量稳步提高，花色品种不断增加。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手表年产量突破了二百五十万只大关，质量达到先进水平。今天，上海牌手表深受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喜爱。

上海手表厂的厂址，就是原来的上烟三厂（解放以前叫英美花旗烟厂）。为了适应手表工业飞跃发展的需要，原上烟三厂的工人大部分都转到了上海手表厂。

许多老工人面对着手表工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望着这一幢幢宽敞明亮的车间，一条条整齐的生产流水线，一只只即将出厂的崭新手表，不由得思潮翻滚……

在万恶的旧社会，工人是工厂的奴隶。在帝国主义、反动派统治下的花旗烟厂工人为了改变受压迫、受剥削的奴隶地位，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侵略军开进了租界。英美的花旗烟厂也被日本鬼子实行了军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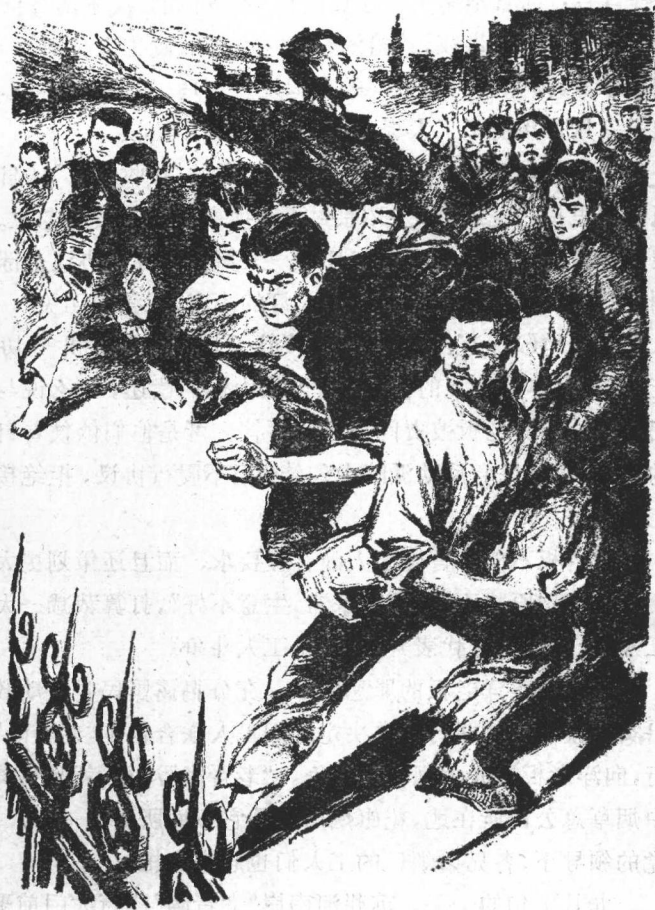
一九四五年春，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即将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日本帝国主义面临着总崩溃的绝境。但是，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为了苟延残喘，变本加厉地对中国人民进行压迫和掠夺。市场上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工人们简直无法生活。

铜匠间工人姚根泉，为了活命，只得冒着生命危险到郊区买米。在回来的路上惨遭鬼子的杀害。姚根泉被日本鬼子杀害的消息传来，整个工厂都轰动起来了，工人们怒吼了！姚根泉的惨死，使工人们不由得想起一年前一个女工被日本鬼子活活折磨死的情景。有一天，厂对面日本宪兵司令部的一个鬼子，突然被杀了。日本鬼子就象一条疯狗，立即下令在卷烟厂附近实行戒严。花旗厂的上千名工人被关在厂里，两天一夜连一粒米也没有下肚。有一个怀孕的女工，两天一夜饿下来实在支持不下，这时她想走出厂门去看一看，没料到站在门口的一个鬼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抡起枪托就往她头上打，她惨叫着倒了下去。工人们闻讯赶来，她已奄奄一息了，不多时便咽了气……。

工人们新仇旧恨涌上心头，齐声说：“一定要为阶级兄弟报仇，向日本鬼子讨还血债！”“日本鬼子打死我们的工人，我们不干了，找日本大班算账去！”

花旗烟厂的党组织决定抓住姚根泉被日本鬼子惨杀的事件，组织工人向日本鬼子讨还血债，同时要日本鬼子偿还积欠工人的米贴三十三斗和九十六天工资。从政治上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使广大工人更加紧密的团结起来。

花旗烟厂的工人分头串连各兄弟烟厂的三千多工人，把日本烟厂的总公司包围得水泄不通。浦东烟厂的二百多名工



人，也参加了斗争的行列。总公司的日本“大班”看到声势浩大的示威队伍，紧闭铁门，拒绝和工人代表谈判。工人们不断高呼口号：“向日本鬼子讨还血债！”“不达目的，决不离开！”斗争一直坚持到下半夜，狡猾的日本“大班”看到工人英勇不屈，坚持斗争，预感他们在中国的命运岌岌可危，知道硬赖是不行了。只得接受了工人提出的要求，签订了协议。

没多久，日本鬼子投降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从日本鬼子手里接过花旗烟厂，又原封不动地奉还给了英美老板。英美老板横蛮无理地把工人与日本“大班”签订的协议全部推翻，胡说什么“你们工人与日本人订的协定，跟我们无关”。工人们气愤地驳斥道：“既然你们接管了日本的工厂和一切财产，那么日本人欠下的债，理所当然由你们偿还，怎么说与你们无关？”英美老板被责问得无言可答。可是他们依仗着自己的势力，与国民党反动派暗中勾结，拒不履行协议，拒绝接见工人代表。

洋老板不但不答应工人的合理要求，而且还策划更大的阴谋，借口“原料不足，销路呆滞，生意不好”，打算裁减一大半工人，企图把工人代表开除，扼杀工人斗争。

为了粉碎洋老板的罪恶阴谋，充分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党决定组织工人联合包围“老晋隆”洋行，向洋老板展开大规模的斗争。“老晋隆”洋行，就是英美颐中烟草总公司所在地，花旗烟厂就是它下面所属的一个厂。在党的领导下，各兄弟烟厂的工人们也赶来支援。

九月下旬的一天，苏州河南岸“老晋隆”洋行大门前聚集着一股股愤怒的人群。这是颐中各烟厂工人组成的示威队伍。人群中不时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口号声，将电车的隆隆声、汽

车的喇叭声完全淹没掉了。把守在门口的几个美国兵吓得缩成一团，躲在门房里不敢出来。

这时，几路大军已经一层层地把“老晋隆”洋行包围得水泄不通。

洋老板看到雄赳赳、气昂昂的工人队伍，吓得魂不附体，急忙下令锁起大门，想把工人挡在门外。有个工人找来一把大铁锁，“咔嚓”一声，大门被反锁上了。说道：洋老板，你也别想出来。站在三楼窗口注视工人行动的洋老板见自己被困在里边，一下子慌了手脚，急忙打电话给美军司令部，妄图用武力来威胁工人。不一会，警报声由远而近，两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卡车气势汹汹地开来了。从车上跳下一百多个荷枪实弹的美国兵，恶狠狠端起刺刀对准工人的胸膛，大家毫不畏惧，工人代表老宋指着美国兵的鼻子骂道：“矮鬼子走了，又来了长鬼子，你们都是一鼻孔出气的！”说完，工人群众一步步逼向美国兵。美国兵凶相毕露，用枪托和皮鞭殴打工人，企图冲散工人队伍。工人们奋起还击，与美国兵展开了英勇的搏斗。工人们抓起马路旁边的石块向美国兵扔去。刹时间，雨点般的石块打得美国兵抱头乱窜，狼狈不堪。美国兵见势不妙，企图从后门接走洋老板，工人们立即识破洋鬼子的诡计，齐声大喊：“不要让他逃走！把汽车包围起来！”美国兵晕头转向，一边朝天开枪威吓群众，一边急忙发动汽车。眼看汽车就要溜走了，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工高声的喊道：“大家躺下来，不要让汽车逃跑。”说完就奋不顾身地躺在车轮前。她的勇敢行动鼓舞了大家，许多工人也纷纷躺在车轮前，刹时间二百米长的马路上躺满了人群。美国兵吓得目瞪口呆，进不能进，退无处退，只好把汽车刹住。

这时，突然下起大雨，工人们的衣服全湿透了，地上又泥泞不堪，大家又冷又饿，但每个人的斗争精神仍旧十分饱满……斗争坚持到第二天早上。这时桥对岸开来一辆黑色的轿车，从车上走下了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后面还跟了一帮子人。这家伙就是特务头子、伪社会局的陆京士。原来洋老板见工人毫无撤退之意，就打了一个电话给陆京士，要他出面来镇压工人。国民党反动派是帝国主义的帮凶。陆京士接到电话，马上就赶来了，企图为他的主子解围。陆京士一下车就气势汹汹地指责工人的要求太高，要工人让步，千方百计地保护洋老板。工人们早就看穿了这个家伙的丑恶嘴脸，根本就不理他这一套。陆京士老羞成怒，恶狠狠地说：“如果你们继续包围下去，不要怪我陆某不客气。”同时又指派他的爪牙混进工人队伍中，散布谣言，挑拨工人内部的团结，企图破坏工人斗争。厂里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分子也乘机出来捣乱。

党组织及时研究和分析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相勾结的情况，预计斗争将会更加复杂，敌人很可能对工人代表下毒手；并且作了周密的布置，暗中组织了工人纠察队，保护工人代表的安全，同时又组织了四批工人代表，准备作更坚决的斗争。

斗争持续了两天。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工人代表决定发动更多的工人和家属一起包围“老晋隆”洋行。大家很快行动起来，又组成一支上千人的队伍，他们一面举着标语牌，一面愤怒地高呼“不许洋老板裁减工人”等口号。雷鸣般的吼声，轰动了两旁过路的群众，许多人都自动地向游行队伍汇拢，人越聚越多，人们的怒火越烧越旺。

队伍中有许多女工和家属，她们把家里的事情放在一边，

赶来参加斗争。锡包间有一个女工叫阿翠，家住浦东，孩子刚满月，也和大家一起参加斗争，并表示不取得最后胜利决不离开一步。她的行动使大家深受感动，许多工人家属都把孩子从家里抱来，喂好奶再送回家去，坚持参加战斗。还有很多家属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凑起来，送到坚持斗争的工人手里，大家不分你我，互相帮助。工人们坚定地说，是斗争把我们的

心连在一起了，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坚持斗争，一定会取得胜利。

特务头子陆京士害怕工人斗争影响全市，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急忙和英美老板秘密商量，只好答应不裁减工人，同意补发米贴。烟厂工人坚持了一个多月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冷饮厂的惊雷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的前身叫“海宁洋行”，是美国流氓海宁生于一九一三年以三十六元美金在虹口香烟桥畔一个破草棚里开设的一家食品厂。奸诈的海宁生仗着帝国主义的权势，用尽种种卑劣的手段，疯狂地掠夺中国经济，打击民族资本，残酷地剥削和压榨工人。在不长的时间内就造起了蛋品和冷饮车间，还增加了糖果生产，成为上海首屈一指的食品厂。“海宁洋行”生产的“美女牌”冷饮，垄断了上海的冷饮市场。

酝酿斗争

一九四七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不断取得新胜利。蒋管区内，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蓬勃兴起，工人运动如火如荼。老奸巨滑的海宁生就狡黠地使了个“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把工厂及其设备以二百万美元出售给国民党伪国防部，抽逃资金；另一方面，积极配合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的“扶蒋反共”政策，让国民党生产军用食品，扩大内战，从中渔利。

一天，海宁生卖厂、抽逃资金的阴谋，传到了工人中间。消息传来，工人们怒火满腔，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大家怎能

忘记；夏天，正是生产旺季，洋老板逼着工人没日没夜地干，盛夏酷暑，烈日炎炎，然而窄小的冷饮车间里，却寒气逼人。工人们仅围着一条破麻袋在冷缸旁操作，把笨重的盘成千次地拎起。冷凉的咸水，冻麻了双手，针刺般地疼痛。一阵热风吹来，使人头晕目眩。冬天，生产淡季，洋老板又大批开除工人，把工人抛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这工厂的那一处不渗透了我们工人的血汗！而今，洋老板勾结国民党反动派，想溜之大吉，把工人一脚踢开，没那么容易！

闷热的夏夜，月白星疏。几个工人聚在离香烟桥不远处的一间破房子的小阁楼上商量开了：

“我们工人不是好欺侮的！”

“不许老板无故解雇工人！”

“我们要吃饭！”

“决不能听任帝国主义的摆布，要斗争！”

“对，要斗争！”坐在油灯旁的老孙开口说。他三十多岁的样子，浑厚的四方脸，宽宽的前额，一双深邃的眼睛。他九岁从乡下逃荒到上海，饱受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欺凌和压榨。苦难的生活磨练了他的性格，加上在工人夜校中接受过党的教育，所以平时敢于说话。他多次参加同洋老板的斗争，在工人中享有一定的威望。他接下去说：“尽管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勾结在一起，也没有我们工人的力量强，我们决不让洋老板的阴谋得逞！从明天起我们就罢工，不许洋老板无故解雇工人，击破洋老板的鬼计，狠狠打击帝国主义的威风！”

“对，罢工！”

“让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看看我们工人的力量！”

小阁楼里又闷又热，汗水湿透了大家的衣裳，可是谁也顾

不上抹一把。跳跃的小油灯映红了一张张愤怒的脸，斗争的烈火在心中燃烧。大家握紧拳头，压低声音喊出一个铿锵有力的字：“斗！”

初次交锋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美国厂长赖生坐着一辆小轿车神气活现地到了厂里，洋老板的忠实走狗蔡明光急忙跑去迎接他的主子。“别神气，给你点颜色看看。”工人们暗暗地说。

老孙首先关掉了吊蛋机马达的开关，迅速走到车间门口挥动自己的工作帽。工人们一见信号，立即关掉了总开关，女工们停止了包装，大家潮水似地涌出车间，迅速地汇集到厂里的草坪上。车间里顿时空无一人，配好的冰砖液流了满地，才从冷缸里拔起的“赤膊”棒冰，凌乱地堆满了工作台。

赖生闻讯感到不妙，正想走出办公室看个究竟，老孙等几个代表早已走了进来。

“听说老板要卖厂，那我们工人怎么办？”老孙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地说道。

一听这话，赖生好比当头挨了一棒，楞了一下，但还假装糊涂：“卖厂？我怎么不知道，大家还是安心干活，工人生活嘛，可以考虑，嘿嘿。”

“别装糊涂，协议已经签订，卖给国民党作军用食品厂，你是厂长，怎么会不知道？”

“价值二百万，赖也赖不掉！”几个工人代表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他。

见工人知道得那么清楚，赖生无可奈何了，好半天，他才

蛮横地说：“工厂是我的财产，卖厂与解雇工人是我的事，与工人无关。你们快去上班，不然，今天的工资全部扣掉。”

这一下，好比火上浇油，工人胸中憋着的怒火一下爆发出来。

“想勾结国民党，把工人抛在一边，办不到！”

“不准无故解雇工人！”

“要生活，要吃饭，不准无故解雇工人！”代表们齐声说。

这一下戳到了赖生的痛处，他拍着桌子嘶叫着：“不行，不行。”

“不答应我们的正当要求，我们就不上班，你也别想离开办公室一步。”代表们严正地警告赖生说。

外面的工人们一听赖生如此无赖，肺都要气炸了。大伙指着办公室说：“赖生要耍无赖，就让他尝尝中国工人的厉害。”

正说着，工头蔡明光贼头贼脑地向工人队伍走来，嘶哑着嗓子说：“诸位，罢工对大家不利，美国老板一动怒，又扣工资又开除，啥‘合算’？”工人们谁也不理他，他又恬不知耻地继续说：“我是为你们着想……”。

“滚！洋鬼子才是你的干爸爸！”人群中有人大声地驳斥道。

蔡明光一见苗头不对，只得灰溜溜地滚回去了。

八月的骄阳高挂，一丝风也没有，天气热极了。工人一罢工，市场上的冷饮马上断了档。冷饮经销商不停打电话来催问，铃声不断。厂门口一百多名小贩为支援工人罢工斗争，叫着要批发棒冰，“要吃饭！”赖生急得满头大汗，两条黄眉毛蹙在一起，好象没了头的苍蝇，在房间里乱转。他没料到工人

会在这个时候罢工，这样不但最后一笔冷饮利润赚不到，而且工人起来斗争，就要影响移交。他又急，又怕，又心疼损失。尽管电风扇呼呼地吹着，脸上却布满了汗珠。蔡明光缩在一边，畏怯地望着赖生。

见到这些平日耀武扬威的家伙，露出一副狼狈相，工人们打心底里乐开了。但是大家心里明白，阴险毒辣的洋老板是决不会罢休的。烈日下，工人们聚在一起商量着对策。

针锋相对

下午三时多，两辆黑色的“香港车”开进厂里，跳下七、八个“包打听”。为首的几个闯进了办公室，其余的在门外一字儿站开。气氛一下紧张起来了。这是赖生利用代表们走出去的机会，偷偷地打电话到巡捕房，想抓几个为首的工人代表，迫使工人尽快复工。

走狗蔡明光又向工人们走来，老远就嚷着：“赖生先生请你们去谈谈。”

“谈什么？”老孙白了他一眼，冷冷地问。

老孙望了一下四周，大家向他投来的是坚定而又信任的眼光，这使他充满了信心，他蔑视地横了一眼蔡明光说：“走！”说着就和代表们向办公室走去。

老孙他们才进门，蔡明光马上“砰”地一下把门关住了。赖生转着两只绿阴阴的猫眼，恶狠狠地问：“带头闹罢工的是你们吧？”

“是我们！”老孙挺了一挺胸，毫无惧色地答道。

“好，只要你说出指使你们闹事的共产党，叫工人马上复

工，就与你无关，还可以……”话音未落，赖生转身打开保险箱，捧出一大叠花花绿绿的钞票放在桌子上，蔡明光嘻皮笑脸地拿起一叠翻弄着，走到老孙面前，说：“美国老板知道你们生活困难，这些钱够你们用的了……”

看到老板如此卑鄙，老孙嘴角掠过一丝轻蔑的微笑，手一扬，钞票撒散了一地。另一个代表也讽刺地说：“这钱还是蔡先生留着烧香用吧！”

一见软的不行，赖生立即露出一副帝国主义的凶相，脸一沉，手拍台子，向旁边“包打听”使了个眼色，一个“包打听”立即从腰间摸出一副铮亮的手铐，哧的一声扔在台子上，另一个“包打听”也拔出手枪，牙缝里迸出一声：“哼，现在是‘戡乱’时期，不说出共产党就拿你们定罪。”赖生满以为这下子可以把工人吓住了。不料，代表们丝毫没有畏惧。老孙理直气壮地说：“我们要吃饭，不准你们无故解雇工人，有什么罪？”另一个工人代表也大声说：“别来这一套！”一个满脸横肉的“包打听”凶狠地说：“想造反吗？”没等老孙张口，几个“包打听”一拥而上，又推又打，把代表们铐了起来，推出门外。

一见来了“包打听”，工人们就知道斗争更尖锐了，大家做好了准备。现在见代表们被铐着推了出来，一个工人猛地朝石凳上一站说：“我们决不能让他们把代表抓去，大家跟我来！”说罢，把披着的衣服一扔，带着四十多人从大炉间旁边向大门口飞快地跑去，另外二百多个工人一齐向停在厂门口的“香港车”涌去。一见这情景，“包打听”也慌了手脚，连忙打开车门，将代表们推进车厢，发动汽车就想逃走。

汽车引擎呼呼地响了起来，这时，一部分工人从旁边赶到，一见汽车发动了，说时迟那时快，“不准开！”随着惊天动地

一声喊，几十个工人拦住汽车的去路，大家昂然抬着头，双眼射出不屈的怒火。汽车离工人越来越近了，眼看就要撞上了，可大家仍然纹丝不动，汽车只得无可奈何地在工人面前停了下来。

一见汽车停了，后面的工人马上围了上来。

“为什么抓人？”

“放出我们的代表！”

大家把“包打听”从车上拖了下来，纷纷责问道。忽然“哧”地一声，车子抖了一下，象泄了气的皮球不能动了，原来是工人们将车轮的气放了。“包打听”不肯交出钥匙，几个工人抡起锄头，铁棍，“乒乒乓乓”地敲开了锁，把代表们放了出来。

“走，找洋老板算帐去！”大家又回身向办公室冲去。

一个“包打听”慌了神，朝天开了一枪。这下工人更愤怒了，只听“冲呀！冲呀！”一阵怒吼，大家咬紧牙齿，挥着拳头。

办公室里，赖生脸都吓白了，瘦长的两腿，不住地打颤。“包打听”们抱头鼠窜地逃了进来，连声叫道：“快，快，要飞行堡垒！”还没有等关上门，工人们早已一拥而入，把办公室挤得满满的。外面的工人把办公室围得水泄不通，赖生拎起电话，一个工人眼明手快，一把抢了下来，顺手一使劲，把电话线也拧断了。

顿时，办公室里气氛紧张了起来。好半天，赖生才假作镇静地说：“好吧，我们美国人最讲文明，最关心中国工人生活，等冷饮时令一结束，每个人发半个月解散费。”

“半个月解散费不少吧，好啦，可以去上班了。”蔡明光在一旁帮腔。

“呸，休想！不答应条件，我们就决不复工！”老孙斩钉截铁地说。

夜，降临了，厂四周的居民们从下午起就关切地注视着工人的斗争，这时有的送来了干粮、稀粥，鼓励工人继续战斗。阶级的友情暖心间，战斗的鼓励增豪情，工人們的斗志更坚定了。

赖生和他的走狗蔡明光平日作威作福，欺压工人，今天看到了工人的力量，赖生原想作些小让步，了结这次斗争，让工人马上复工，但工人们识破了他的诡计，根本不理这一套，他心中又虚又怕。

这时，几个小工头乘刚才混乱之际，偷偷地爬墙溜走，报信去了。赖生听到有人出去报信，好象捞到了救命稻草，蔡明光为了故意拖延时间，也晃着脑袋说：“诸位，请再派代表来谈。”

工人们早就识破了他的缓兵之计，齐声说：“没有什么可谈的。”逃走了两个小工头，大家预感到一场更激烈的战斗即将发生，老孙把工人们召集在一起说：“洋鬼子和反动派是一路货，赖生可能勾结国民党军警来。”

“如果军警来镇压，我们就砸机器，决不让洋老板阴谋得逞！”

几个工人赶走了白俄门警，守住了大门，有的工人找来了铁棍，准备战斗。

坚持不懈

夜色沉沉。远处，忽然响起了一阵凄厉而又刺耳的警报

声，三辆“飞行堡垒”向香烟桥直驰而来，在海宁洋行门口，猛地刹住，接着气势汹汹地跳下几个国民党军警，向大门走来。

听到警报声，工人们早就有了戒备，关上了大铁门。

一见工人关了门，军警大声嚷道：“开门，开门！”

“不开！”工人们坚定地说，并拿起旁边建造花园的砖头准备自卫。

“不开就冲啦！”警官鬼嚎似地叫着。汽车引擎响了起来，看来反动派要冲门了，可是工人们毫不畏惧，多年来的仇和恨一齐涌上心头，化作无穷的力量。老孙等几个代表站在最前面，一手捏着砖头，一手紧握铁棍。女工们也手挽手，并肩站着，有的工人扛来铁板桌子，筑起了一道防线，黑暗里，一双双睁大的眼睛闪着愤怒的火焰。汽车没走几步，停了下来，原来这是反动派吓唬人的鬼把戏。

又停了会，十几名军警抡起枪柄乒乒乓乓地开始砸门，工人们坚决顶住，一面不停地向外扔砖头，并一起喊道“要吃饭，要工作，要民主！”激昂的口号声在寂静的夜空显得格外嘹亮，四周的居民也来助威了，人越来越多，把三辆车子围在当中，那警官焦躁地一面命令士兵把居民赶走，一面歇斯底里地狂叫着：“再不开门，老子开枪啦！”

“砰，砰，砰！”反动派朝天开了几枪，三挺机枪转了过来，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工厂的大门，情况十分危急。

一见敌人要下毒手了，老孙带头叫道：“你们开枪，我们就砸机器啦！”

“对，开枪就砸机器！”

几个工人跑到冷冻机房门口，准备下手。

赖生见反动派的军警来了，自以为有了希望，哭丧的脸上

露出了奸笑。

忽然听到工人们要砸机器了，他急忙从沙发中跳了起来。气急败坏地说：“谁，谁敢动手，不，不许砸机器。”

“外面军警要开枪，我们就砸机器。”大家坚定地回答。

这句话就象一记重锤砸在赖生的心上，工人们一砸机器，不仅捞不到钱，而且影响移交，那他的一切全完了……想到这里，一股凉气直抽脊梁。

这时，只听“轰隆”一声，这是工人将机器房的门砸开了。赖生一惊，浑身发抖，面如土色，一身冷汗，眼见工人们一个个怒气冲冲，愤不可遏，他绝望地摇着手，颓然地说：“快，快，叫军警退走！”

几个小喽罗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厂门口的警官正焦躁地骂着人。前面，工人们斗争坚决，门关得紧紧的，进不去，还不断有砖头飞来。四周的穷人不但没有被赶走，反而越聚越多，群情激愤，你一言，我一语地诉说着洋老板的罪行，把三辆“飞行堡垒”挤在当中，动弹不得。要开枪，工人砸了设备，弄成个破摊子，他也不好交代，正束手无策进退不得。这时两个小工头跑来说，洋老板叫你们“撤退”。话刚说完，三辆“飞行堡垒”乌龟似地慢慢向后退去。

随着远去的车轮，赖生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他罪恶的阴谋也破产了。他抬起阴沉沉的双眼环视了一下四周，工人们斗志昂扬，精神饱满，有的还拿着铁棍，露出一股坚定的，必胜的信心。一天一夜下来，赖生早已精疲力竭，知道工人不是好惹的，只得垂头丧气地答应了工人的条件。

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工人们挫败了帝国主义的阴谋，把洋老板斗得狼狈不堪，威风扫地。工人们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这时，一轮红日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跃了出来，金色的阳光洒满了大地，照得工人们心里暖洋洋，他们迎着朝阳，满怀战斗的豪情，准备迎接新的，更艰巨的战斗。

以后，随着解放战争的捷报频传，工人运动日益高涨。工人人们的斗争的规模，好似大海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最后，迎来了一九四九年胜利的炮声。

抽逃资金阴谋的破产

上海理发工具厂的前身是新中华刀剪厂。

一九二七年，老板陈发源在常熟开了一家小小的刀剪店。十年以后他用剥削所得，又跑到上海买了几间板房，雇了二、三十个工人，开起了新中华刀剪厂。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一度独霸中国刀剪市场的日商汉和洋行的附属刀剪厂倒闭，新中华刀剪厂也就成为中国唯一的刀剪厂而出了名。到一九四七年，由于陈发源残酷剥削工人和投机取巧，职工人数从几十人增加到三百三十五人；产品也从理发剪刀、轧刀等几种简单产品发展到电轧刀、电吹风、西式轧刀等十几种产品。另外还增开了一个附属刀剪厂、一个刀剪工场和一个发行所。于是陈发源得意洋洋地自封为“远东刀剪大王”。

然而，陈发源的黄粱美梦却是好景不长。一九四八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光辉胜利，解放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军事形势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国民党反动派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境地。“刀剪大王”陈发源预感到蒋家王朝行将灭亡，自己这个“大王”也将做不成了，几十年来“苦心经营”的财产就要归人民所有。于是他就想来一个“金蝉脱壳”之计，妄图把资金抽逃香港。

还是在一九四八年上半年，陈发源就妄想把他在上海剥

削来的现款套汇到香港，用跑单帮的形式，把大量的产品偷运到香港去销售。他先在香港买地造房搞了一个新中华刀剪厂的“发行所”。这个名为“发行所”的机构，实际上是个另起炉灶的筹备处。他又从国外购买机器运到香港，准备在香港建立新厂。当时国民党政府越来越腐败，通货膨胀，物价一日三涨，工人生活更加贫困。陈发源却乘机大量囤积原料运往香港，加紧剥削和压迫工人，强迫工人日夜连续干活，把存厂的原材料突击加工成商品，以便他运到香港去卖。唯利是图的“刀剪大王”就是运用这些卑劣的手法，妄图在上海解放之前把厂里的一切值钱的东西，统统弄到香港。当年年底他还亲自到香港去“督阵”。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份发工资这一天，工人们拿着米袋，围着帐房间等着发工资。可是等了很久不见帐房间发薪的窗子打开。工人们焦急地等着：“怎么还不发？再等一会儿又要买不到多少米了！”有的工人忍不住，连连敲窗催发。这时帐房先生向工人扫了一眼不阴不阳地说：“近来局势混乱，生意清淡，发不出钞票，现经厂方决定，每人发两把轧刀。”

工人们一眼就看穿了资本家的阴谋，大家都明白，老板把实物当工资不是没钱，而是要钱。因为这时国民党统治区一片混乱，交通运输极不正常，资本家抽逃产品不如抽逃现金方便。有的工人就提醒大家说：“最近前线打得很激烈，听说上海有许多大老板都在往香港逃，前些日子，陈发源老板也去过香港，不知道他又在搞什么鬼名堂。”

“一定是他想抽逃资金溜之大吉。”

当即工人们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商议了一番，决定将计就计，不让老板的阴谋得逞。

第二天一早，厂里工人全部停工，带着发到的轧刀，排着队向发行所走去，一路高喊：“啾卖咪，双箭牌轧刀。”到了发行所的门前，大家就摆起摊头，喊着：“双箭牌轧刀打八折，啾卖咪！”

不一会，发行所的大门打开了，老板的走狗发现门口一群一群工人都在地上摆着轧刀摊，大吃一惊。他情知不妙，一边咕哝着：“真是存心捣蛋！”一边急忙爬上楼，叫醒老板，说：“陈先生，工人造……造反了，把轧刀都拿到发行所门口来卖了！”

陈发源揉了揉眼睛，吃惊地跳了起来，披着衣服，拖着鞋子，急忙推开窗子，伸出脑袋往外望，只见下面全是厂里的工人。这可急坏了陈发源：如果没有人做生活，这个月的轧刀就不能按期如数地运往香港，上海的摊子就收不了，这真比割掉他身上的一块肉还心疼。再一听，工人们正在喊着：“双箭牌轧刀打八折，啾卖咪！”“什么？打八折？”陈发源倒抽了一口冷气，他想这样一来发行所的轧刀就销不出去了，“双箭”牌，就会坍了牌子，断了财源。陈发源跌跌撞撞地冲到楼下，强作镇静地满脸堆着笑说道：“大家有话好说，何必这样呢？”

工人们气愤地说：“你为什么不发工资？”

陈发源装模作样地说：“啊？是这么回事！本人不知道，我马上打电话叫他们发工资。”工人们大闹发行所的行动对陈发源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迫使他不得不发给工人们现款。这次斗争，使陈发源一连好几天睡不着觉，他感到工人斗争的力量是他今后继续抽逃资金的最大阻力，发了几把轧刀就引起了这么强烈的反抗，以后要运走机器就更难办了。他越想越不安，越想越害怕，脑子里只想“快逃”。陈发源抽逃心切，他眼

看厂里所存的原材料越做越少，决定分批解雇工人。但是，先解雇哪些人呢？

一天晚上，陈发源在发行所召开了“领班”会议，策划解雇工人的阴谋，大小领班一凑合共提出了四十多个人的名单，这些人大多数是工人斗争中积极分子和大闹发行所的骨干，他们认为这样一来，不但可以为日后关厂作组织上的准备，而且还可以使剩下的人老老实实任其抽逃资财。陈发源自以为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办法，就叫人写成布告。趁有些工人回乡过年，厂里人少之际贴了出去。留厂的工人早就有了准备，一见布告火冒三丈。气愤地说：“老板想把我们解雇了，到香港去开厂，我们决不答应！”

春节的初四，回乡工人陆续回来了，听到这个消息，个个怒不可遏。大家一起商量着对付老板的办法，认为老板是既想抽逃资金，又想赚钱，所以一面解雇工人，一面拚命叫工人加班加点。于是工人就利用这个矛盾，决定举行全厂罢工同老板进行斗争，这样就不仅可以揭穿他开除工人的阴谋，而且也打乱了他逃往香港的计划。

第二天，上班铃声早已响过，可是整个厂却冷冷清清，不见一个人。罢工斗争开始了！老板气急败坏地跑到工人住处，又喊又叫，威逼工人立即复工，可是工人一个也不理他。众口一词坚定地说：“四十几个人不复工，我们就全部不复工！”资本家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竟又拉拢同乡人，妄想以此来破坏工人的团结，瓦解工人的斗志，但是工人们坚如磐石，众志成城，他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了。

几天过去了，工人们仍然坚持斗争，毫不动摇。这时，淮海战役已经胜利结束了，北平（北京）也和平解放了，前线捷报频

频传来。陈发源如坐针毡，他预感到越和工人僵持下去，越对他不利。这时，汉口的客商也来催货。处在内外交困中的陈发源狗急跳墙，决定孤注一掷，将厂里剩余的设备 and 半成品全部突击运往香港，这样既可以达到破坏罢工的罪恶目的，又可以把全厂财产迅速彻底地抽逃到香港去。

初十的清晨，北风呼啸，厂里仍然是一片冷冷清清，罢工斗争继续进行。有个工人从外面进来，见厂门口停着一辆卡车，又发现陈发源正急急忙忙地指挥着几个狗腿子，鬼鬼祟祟地钻进车间，又是扛又是抬，把一箱箱的半成品，一只只的马达，一台台的机床往卡车上装，就一口气跑到工人住处，通知大家，工人们一听霍的一下子全站了起来，大家脑海里是同一个念头：“决不能让资本家把机器盗走！”他们一面派人到厂外通知住在附近的工人，一面集合了在厂的所有工人，向厂门口奔去。此时卡车上已装满了东西，老板陈发源正得意忘形地催司机快开车。工人们一面向卡车冲去，一面高声喝道：

“不许开！不许开！”大家冲到了汽车前，有的拦住汽车，有的干脆就攀上卡车，把上面的东西往下卸。面对这个情景，陈发源吓得连连倒退，慌忙说：“你……你们这是干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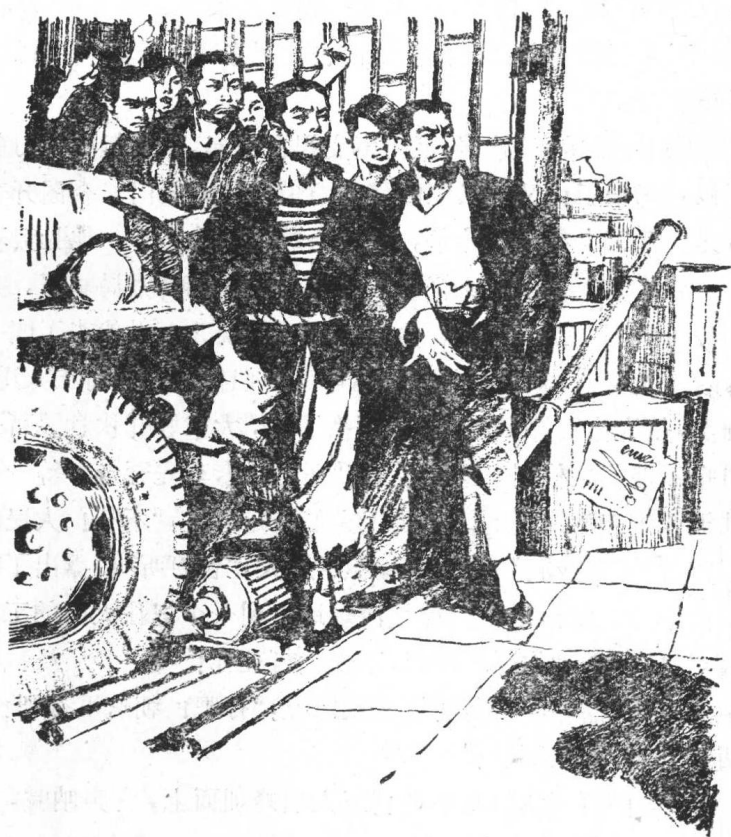
“你为什么要盗机器？”人们大声责问。

“这是我的东西，不关你们什么事。”陈发源厚颜无耻地说。这话激怒了工人们，大家立即予以驳斥：

“呸！是你的东西？你哪儿来的？”

“还不是靠我们造出来的？这些东西是我们工人的，就是不能动！”

这时，一个工人抢上一步，一把夺过卡车上的钥匙，两个狗腿子着了慌，马上窜了上来抢钥匙，这个工人怎么也不肯放



手。陈发源的弟弟——三老板见此情形，凶相毕露竟对准这个工人猛击一拳，两个狗腿子就乘机从工人手里抢走了钥匙，这个工人立即予以还击，对准三老板就是一拳，疼得他哇哇直叫。正在这时，住在附近的工人已闻讯赶来了。

工人们怒喝道：“呸！你滚回去！把东西卸下来！”边说边猛撞铁门。

霎时，怒斥声、喊声、撞门声交织在一起，整个新中华刀剪厂沸腾起来了！又气又急的陈发源慌忙扑向大门，企图开车逃跑。但工人的英勇斗争，使他不敢越雷池一步。他见势不妙，就偷偷摸摸地溜进帐房间打电话，向伪警察局求援，企图通过他们对工人实行暴力镇压。不一会儿，果然来了四个端着手枪耀武扬威的“包打听”，起先他们假惺惺地对工人讲：“老板是为你们好，把这些东西换了钱，大家好开伙食。”可是谁也不理他。他们又继续说道：“还是让卡车先开走，等一会儿派代表来解决问题。”可是工人们坚定地讲：“不行！人民的财产就是不能动！”鬼话欺骗不了工人，“包打听”便露出了豺狼的本相，掏出手枪，神气活现地走到一个把住大门的工人面前，威吓道：“你开不开门，不开就打死你！”

工人把胸脯一挺，斩钉截铁地说：“打吧！朝这里打吧！告诉你，打死我也不开！”

“对！打死我们也不开！”工人们蜂拥而上，齐声呐喊，这喊声雷鸣似的在空中回荡。

这时厂外面的人越来越多，连住在附近的居民也来为工人们助威。

老板暴跳如雷，象头受了伤的野兽，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包打听”拳打脚踢地拉开站在车前面的工人，妄图打开

一条缺口，让卡车开走，工人们立即在卡车前面排成一道“人墙”，资本家、“包打听”用九牛二虎之力拉出了站在队伍中间的几个人，有几个工人甚至当场被打伤，但两旁的工人又迅速地合拢来，堵上了缺口，犹如铜墙铁壁，不可战胜。

“开！开！压死人我负责！”老板垂死挣扎，命令着狗腿子开车。

外面的工人看见自己的阶级弟兄被打，又见老板催着开车，更是火上加油，“哗啦”一声，门被撞开了，外面的工人冲了进来，“包打听”吓得魂不附体，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逃走了，老板也抱着脑袋仓皇逃进帐房间，愤怒的人群立即把帐房间包围起来。老板吓得缩成一团，不得不同意卸掉车上的东西。资本家威风扫地，工人们扬眉吐气。

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眼前。为了迎接解放，工人们百倍提高警惕，自动组织起工人纠察队。他们日夜轮流巡逻值班，监视着老板的行动，保护人民的财产。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风卷残云之势，挥戈南下，上海解放了！工人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陈发源抽盗资金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罢印伪钞的斗争

一九四九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势如破竹，长驱南下，挺进到长江北岸。蒋介石经营了二十二年的反革命老巢——南京反动政府，完全暴露在我军的炮口之下。国民党反动派吓得心惊肉跳，但又不甘心失败，妄图作垂死的挣扎。濒于灭亡的反动当局，为了加紧搜刮民脂民膏，采取种种高压手段，强迫印刷工人加印伪金圆券。

那时候，中华书局上海印刷所的胶印机，在反动派的控制下，几乎全部被迫承印伪钞。工人们亲眼看到：一箱一箱的纸币发放出去，通过伪“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转瞬之间，就回笼了一箱一箱的黄金、白银。在呜呜的汽笛声中，一船一船的金银，流出吴淞口，盗运到台湾。反动派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工人们的极大愤慨。

工人们深刻地认识到，由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拼命发行纸币的结果，造成金融危机，通货膨胀，商业萧条，物价飞涨。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的十二年间，物价就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在这蒋家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的时刻，伴随着“金圆券”的滥印狂发，物价更是加速上涨。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圆券”发行初期，二十万元可兑金条一百根（合黄金一千两），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前夕，二十万元只能买一根油条！一口袋的钞票只能买到半口袋的大米；市场上争兑金银你抢我

夺，吵闹不休，以致轧死了许多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再加上连年内战，使蒋匪帮统治区的千百万劳动人民怨声载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现在，反动当局又想趁临逃之机，滥印“金圆券”大捞一把，就没那么容易了！在这长夜将尽、即将破晓的时刻，工人们决定用最后的斗争，迎接胜利的黎明。于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一场不屈不挠的反对印刷伪钞的斗争蓬蓬勃勃地展开了。

这年春节刚过，伪中央银行通过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叔明出面，把加印一批“金圆券”的应急任务塞进中华书局。李叔明接到加印“应急”金圆券的任务，就给爪牙们下了一道命令：“对工人严加监视，催督快印，不得有误！”

当时物价一日三涨，印刷的伪钞也是一天一个样：昨天印的还是“2500”元，今天却要印“25000”元，到了明天，又要印“250000”元了！大家都知道，币面票值以天文数字十倍、百倍、千倍无限止地增大，就是意味着钞票大幅度贬值。所以，每当“金圆券”上的票值加上了一个“0”字，就活象又多了一张凶恶无情的虎口，因为这样一来，不知道又有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填进官僚资产阶级的腰包；又将有多少劳动人民在饥寒交迫的折磨中死亡！这次，加印的“应急”金圆券币面票值数字后面，果然比以往又增加了一个“0”字。另外，反动当局做贼心虚，为了欺骗社会舆论，蒙蔽各界人民，严禁泄密，在车间里加强了控制，内外设门三道，每道都有警察把守，严密监视工人，工作时连讲话都不允许，大小便有人钉梢，进出都要抄身。工人们对此忍无可忍，决定以“要吃饭”、“反迫害”为由，拒加夜工，进行怠工斗争，千方百计少印钞票，打击敌人，加速国民党反动派的灭亡。

一天午后，所长正在办公室里同一个工头一起策划如何加强对工人的监视。忽见一个工贼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说：“不不……不好了，工人都走光了，车间里机器都停啦！”

原来今天工人领到工资后，搁下机器出去买户口米了，这个请假两小时，那个请假三小时，尽管工务主任竭力阻拦也没用，大家还是一窝蜂地拥出了厂门。车间里冷冷清清，印钞票的机器都抛了锚。

听到工人都走光的消息，所长摘下近视眼镜，擦着镜片，奸诈地对一个工头说：“要谨防共党的赤化宣传！丁先生，你要多多出力啊！”

“滴铃铃铃……”电话铃响了。工贼“毒钉子”神经质地拿起话筒，听了一下，说：“所长，你的电话！”

所长拿起话筒，知道是李叔明打来的，马上堆着一脸的笑纹，似乎上司就在他面前，卑躬屈膝地对着电话机说道：“……是！……是，是！”他挂好听筒，对“毒钉子”说：“李总经理对厂里的情况很关切，限我们把这批贰拾伍万元头的钞票在明天一早送交银行，逾期要追究责任！”他咬牙切齿地说：“看来得马上采取措施！赶快通知下面，今天一律加全夜工，告诉他们：违者严惩不贷！我到号码间、检查课去看一下。丁先生，请你到车间去走一趟！”

车间里死气沉沉，只有几个工人懒洋洋地坐在机器旁。“毒钉子”走近铁丝网，凶相毕露地骂道：“人都死光啦？！”那几个工人没有一个睬他。“毒钉子”大发雷霆：“是谁允许他们出去的！简直无法无天！快，快开车，有几个人就几个人做！”

这时，一群工人从车间外面走来。“毒钉子”一见，便说：“你们来得正好，竖起耳朵听着：上级命令，今天一律加全夜

工，一个都不准请假，明天天一亮就要把这批钞票印完！”

工人们说：“不行，厂方给我们的工钱，是按上半个月的生活指数发的，现在能买多少米？我们饭吃不饱，没有力气加夜工！”

“你们到底做不做？！”“毒钉子”要起流氓手段来。

“这样下去就是不做，我们吃不饱饭！”工人们没有被他的气焰所吓倒。

“这个，……要由总经理裁决，不管我的事！”“毒钉子”把手一摆，“反正你们一律不准回家，饿着肚子也要给我加夜工！”说完，又死命地催促：“快开车，快开车！”

一个与党组织有联系的高个子工人从人群中站起来说：“好，就照丁先生的话办吧，我们开车！”他向工人们递了个眼色，工人们会意地动手开了车。“毒钉子”听到马达响了，看到滚筒转了，站在旁边洋洋自得。但是他哪里晓得，机器上慢吞吞印下来的钞票都是浓一块淡一块的坏片，颜色斑斑驳驳，很不象样。这时“毒钉子”脑子里只想工人开车，并且开得越快越好。他看到印刷机开得还不够快，就顿着脚催促道：“妈的！开快点！开快点！”工人们真的又加快了车速，机器“呼呼”地转动。“毒钉子”面露喜色。等到他大摇大摆地走近印张一看，只吓得他大惊失色。原来，他看到钞票上堆满了青一块紫一块的颜色都成了废品。“毒钉子”急得连声叫道：“快停！快停！”由于机器声大，工人们装作没有听见，机器仍然不停地转动。

“毒钉子”继续扯着喉咙干嚎着：“出毛病了，快关车！”

工人们一动不动，只是冷冷地回答：“丁先生，你一会儿叫快开车，一会儿叫快关车，到底要怎么样？”

“嘿！你们看，这样的东西拿出去，不要命了！”“毒钉子”象条恶狗，马上窜到一台机器旁，想关闭启动闸，不料他心慌意乱，错把闸杆扳到相反的方向，结果机器反而运转得更快。

事情是这样的，工人们故意没有把印版上的胶水揩透，印版坏了，印出的产品就报废。等到所有机器停下时，每部车子都已印了厚厚一大叠废品。“毒钉子”想，自己当着那么多工人的面大叫开快车，自然要负责任，所以也不敢在上司面前透露半点风声。机器上的印版坏了，得由晒版间重新晒版。工人们趁机等工，结果夜工也无法开成。

后来工人们进行怠工的方式就是借口保养机器，每天早晨开车前总要慢条斯理地用好长时间摆弄机器；在印刷的中途，也用各种理由把机器开开停停。有时候，工人们还故意在铬酸缸里多掺些水，把药水冲淡。^①

也有的工人悄悄地在纸上喷些水，使纸张发生伸缩或弓皱，为停印制造理由。从此，故障越来越多，钞票越印越少。

这下，总经理李叔明可急得不得了。一天，他赶紧把“毒钉子”叫去，狠狠地骂一顿，责令他强迫工人加夜工，把造成的损失捞回来。“毒钉子”随即遵照主子的命令，强迫工人当天就加夜工。工人们当然不买他的帐，愤愤地说：“我们吃的猪狗食，干的牛马活，日班做下来已经精疲力尽，哪有力气加夜工？不加，坚决不加！”

“毒钉子”恼羞成怒恶狠狠地说：“你们敢不加夜工，警察局的‘飞行堡垒’可不是吃素的！”

① 铬酸的作用是防止印版上的空白处粘上油墨，在印刷时必须保持一定的浓度。药水一淡，就势必造成印版上的油腻腻，使印下来的钞票成为废品。

工人们齐声回答：“不管你‘飞行堡垒’还是‘爬行堡垒’，咱们都不怕！”

工人们眼看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就要垮台，都充满着斗争必胜的信念。

“毒钉子”本想吓唬一下工人，想不到工人占了他上风，比他还硬。他狗急跳墙，顿时脸孔铁板，嘴硬骨头酥地狂叫：“废话少说，今天的夜工，不加也要加！谁敢说个‘不’字，我毙了他！”说着，竟从腰里拔出手枪。

“不许动！”工人们站起来，厉声喝道。

“毒钉子”吃了一惊，把手枪放了下来，但是嘴里仍强硬地说：“怎么……你们想造反？”

“你算说对了！”

说时迟，那时快，七、八个工人拥上去，早有人夺去了“毒钉子”的手枪。有的工人拉住他的手，有的工人拖着他的腿，大家一齐把“毒钉子”按倒，叫他来了个“四脚朝天”。

“滚！”工人们大喝一声，把他扔出了车间门外。“毒钉子”连忙爬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扭过头来恶毒地对工人们说：“你们等着吧！”说罢便趑趄地溜去。

大家看着“毒钉子”的狼狈相，知道他决不会就此罢休。再说，加夜工既是李叔明的鬼主意，打了“毒钉子”，也不能最后解决问题。于是，大家围拢来，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决定趁热打铁，先发制人，找李叔明算帐去。“找李叔明算帐去！”“冲银行去！”顿时，全厂各车间推派出四、五十个工人代表，一齐拥上一部大卡车。所长闻讯，急得汗水直流，匆匆带着全副武装的伪警察赶到厂门口，企图拦截。可是，满载工人的大卡车，车轮滚滚，喷着大气向他们逼进，把他们吓得连连倒退。

暮色笼罩着黄浦江。在外滩“中国农民银行”的一幢大楼里，李叔明正在向他的要员传达白天银行公会常务理事会议的精神。常务理事会按伪财政部的指令，决定变换花样，发行“黄金短期公债”，趁机向老百姓大捞一票，准备逃之夭夭。

“都！都！都都！！”大卡车一停下来，还没等门警进去报告，几十个工人已经象潮水一样涌到会议室门口。李叔明一见工人，便感到情况不妙，不由得打了几个冷颤。他慌忙走出来，双手一摊，皮笑肉不笑地说：“李某事务缠身，多时未到厂里看望。诸位……”

工人们对他这一套看得多了，知道他的内心既空虚，又惊恐。大家心想：你们的总头子蒋介石连同几百万军队都快完蛋了，你这条看家狗，还不是秋后的蚂蚱，能有几天蹦跶。大家大步地冲进会议室。

李叔明搔了搔头皮，干咳了几下，壮着胆子，装腔作势地说：“你们有什么具体要求不妨说一说嘛，我们开个董事会商量商量，改日答复。”

工人们一下就识破了李叔明的诡计，开门见山地说道：“要求只有一个：我们不加夜工！”

李叔明原以为，工人闹事，还不是为了几个钱。可是这些工人竟提出不加夜工，那不是要误了大事吗？李叔明急得脑袋发胀，两手冰凉。他说：“这样吧，夜工还是须加的，我们不但给你们发加班费，还要给你们增加工钱。”

工人们心里明白，我们斗争的目的是拖延印伪钞，迎接解放。对方想用几张连草纸都不如的金圆券来叫我们加夜工，真是白日做梦！便说：“不管怎么样，夜工坚决不加！”

李叔明只剩最后一张“王牌”了。他决定用硬的一套来威

吓工人，杀气腾腾地说：

“钞票印不出来，要影响‘戡乱大业’，该当何罪！”李叔明终于露出了国民党CC派特务头子的狰狞面目。

“什么‘戡乱’不‘戡乱’！是你们在作乱，打内战。是你们用金圆券来榨取老百姓的血汗！”一个工人代表挺身而出，据理力争。

“你有几个脑袋，竟敢这样大胆放肆！”李叔明用手拍了一下桌子。

这个工人脸上毫无惧色，指着李叔明说：“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李先生，我看你还是好好想想你自己的命运吧！”

李叔明把利害关系权衡了半天，深怕更进一步惹怒了工人与己不利。可怎么是好呢？终于，他阴险地从牙缝里吐出一句话，问那个工人代表的名字。

工人们见李叔明又要耍花招，就齐声怒责：“问他名字干什么？要抓人坐牢吗？好，我们一起去！”这声音，如隆隆炮声，震动全屋。

“对，要坐牢，我们一起去！”这时，从门外又冲进来一批印刷所的工人。发行所、编辑所也来了不少人，把会议室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

李叔明慑于工人的威势，开始装死了。他说：“啊哟，时候不早了！明天一早我有公事，你们先回去。你们的要求嘛，明日给予答复。”

“不行，不答应条件，我们白天也不干。”

“对！白天我们也不干，没有什么好谈的了，我们回去！”

“哎，哎，请慢！再商量，再商量！”李叔明一听工人说白天

也不干，着急起来了。他心里盘算着，如果工人长期罢工，那可不得了，眼下正闹着严重的钞荒，金融市场上需要的钞票是越多越好，一天停印不得，他转了几个圈子，搭拉着脑袋无可奈何地说：“好吧，夜工就不加了。”

一个工人代表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预先准备好的写有不加夜工、增加工资等项条件的纸，往桌子上一摊，说：“口说无凭，你马上签字！”

李叔明出于无奈，只得抖抖索索地拔出钢笔，在那张纸上签了字。

工人们手挽着手，走在外滩的大道上。大伙儿的心潮，犹如黄浦江中的浪涛汹涌澎湃。大伙儿的心情，仿佛长夜中轰鸣的惊雷。大家决心用最后的战斗，迎接胜利的曙光！

只有拿起枪

一九四九年五月，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乘胜前进，二十七日，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这个昔日“冒险家的乐园”，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一队队精神抖擞的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地迈步前进。成千上万的上海人民，簇拥在马路的两旁慰劳身经百战的解放军战士，他们放鞭炮、舞红旗、端茶水，热烈欢呼子弟兵进城。

聚集在路边欢迎队伍中的益丰搪瓷厂（即现在的上海搪瓷一厂）工人，看到前面过来的解放军队伍中，有位身骑高头大马的中年指挥员，人群中不知谁说了一声：“啊，那骑马的不是老瞿吗！”工人们顿时注视着这位解放军指挥员。

“对，不错，是我们厂的老瞿。”

“啊，老瞿回来啦。”

老瞿随大部队刚到工人们身边，正好前边传来了原地休息的军号声。

这时工人们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异口同声地叫道：“老瞿……”这位指挥员听到有人叫他，急忙转头一看，一张张熟悉的笑脸呈现在他的眼前。这些不是当年同甘苦，共患难的师兄弟吗？他赶忙跳下马，快步向人群中奔来，喜出望外的人们顿时围住了他。

“老瞿你们参军后，我们真想念你们呐！”

“老邱他们也一起打回来了吧？”

“老瞿啊，十年了，你们可打回来了。”工人们亲切地问长问短。

“回来了。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打回来了。”

是啊！天亮了，群魔乱舞，豺狼当道的漫漫长夜终于过去了。望着这威武雄壮的人民军队，望着这万众欢腾的景象。大家思潮翻滚，百感交集，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

一九二六年，老瞿才十三岁，就与一批年龄和他差不多的孩子一起，进了益丰搪瓷厂搪烧工场当童工。

那时工人们都把搪烧工场叫“火焰山”。工场的中心是温度高达九百度的炉子，炉旁排着一长列烧得通红的烘床，工场四周是密不通风的墙，没有一扇窗，一到大伏天，工场里又闷又热，气温达到摄氏五十多度，老板为了逼工人为他卖命，每天一上班就“咔嚓”一声把唯一的一扇小门也锁起来，工人们就在这蒸笼似的工场里进行牛马般的劳动，身上的汗水成串地往下淌。“搪烧搪烧，火烤火燎”，脚上的木拖鞋烤焦了，手臂双腿上的汗毛烤光了，浑身皮肤烤得通红，面颊被炉火灼得发紫，口渴了，只能喝一口水。头晕了，就冲一盆水。水是唯一的防暑“法宝”。不少工人常被烤得昏倒在炉灶旁。

那一年正是益丰搪瓷厂董家老板玩弄手段，大发横财的日子。“五卅”运动发生后，见风使舵的董老板趁着全国人民坚决抵制日货的机会，装出一副爱国的面孔，生产了大批所谓纪念“五卅”的“金钱牌”老兰花面盆，底部装模作样印着“毋忘五卅”四个大字。一时销路猛增。

利欲熏心的董老板，见金钱牌老兰花面盆奇货可居，油水很大，就一面卑鄙地把“新新”公司卖不出去的大批“东洋”货



面盆转买过来，喷上老兰花，盖上“金钱牌”图章，印上“毋忘五卅”的字样，当作“国货”卖出去；另一方面，拚命催逼工人日夜加班，把一大批积压的次品贴上正号商标抛到市场上。这一年，单在这种“金钱牌”老兰花面盆上，老板就赚了十八万银圆。

老板发横财，工人活受罪，大把大把的银元落进资本家的腰包里；大滴大滴的工人血汗洒在吃人的工场上，工人整天累得昏昏沉沉，象断了脊骨，女工遭到更惨重的压榨，贴花工场怀孕的女工，被强迫进行一天十二、三小时的繁重劳动。由于资本家的长期剥削，体弱无力，在搬运时，只得把一叠叠面盆压在肚皮上。真是孩子还未出娘胎，就已受到“金钱”的压迫。

唯利是图的董老板，为了拚命赚钱，他将贴花改为喷花，这样一来，工人的劳动强度更大，劳动环境也更恶劣了。喷花工场粉尘飞扬，迷迷蒙蒙。几步之外，人形不清。喷红花的工人是红面孔，喷蓝花的工人是蓝面孔，在这种矽尘弥漫的环境里，工人吐出的唾液也都是五颜六色。因此工人个个都是骨瘦如柴，得矽肺是司空见惯的。与老瞿一起进厂的一位童工就是得了矽肺，含愤死去。工人们向厂方提出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董老板竟穷凶极恶地说：“不要多噜嗦，要做就做，不做就给我滚。”工人们听了，恨得牙齿咬得格格响。

一次，制坯工场的童工阿荣，在装机器上的过桥皮带，不慎被卷到半空摔下来，楼板也打了一个洞，人断了三节，当即死去。老板赶来，开口就说：“机器坏哦？”工人们气愤地一把拉住他，要他负责，并叫他买棺材。老板阴笑着说：“又不是我叫他死的，给他买棺材作啥！”说完转身就溜走了。工人们看着伙伴血肉模糊的尸体，心中怒火燃烧，恨不得冲上去咬老板几

口。这一件件亲眼目睹的惨事，这一笔笔阶级兄弟的血债，在工人们的心里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工人们不甘心忍受老板残暴的压榨，经常与老板开展斗争。搪烧工场的工人趁监工不在，将刚从炉灶里叉出来的通红面盆，在铁台角上一敲，马上是一个深凹进去的瘪膛，变成了废品，每天几十只，抛在空地上。久而久之，堆满了半个场地，象座小山。有的工人还故意把刚烧出来的面盆趁热马上叠起来，两只面盆紧粘在一起，再也撬不开。大家看到成堆的废品，都觉得出了一口气，暗暗感到高兴。

但是，敲坏几只面盆，让老板少赚几个钱，工人们虽出了口闷气，但还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在盼啊，盼望救星毛主席，救星共产党。

抗日战争期间，党组织派来了工人的贴心人，一个姓钱的邻厂工人常到厂里来。老钱对工人和气亲热，平易近人；与工人很合得来，每到发工资时，他就对穷苦兄弟们讲：“工人辛辛苦苦，只拿一点点；老板惬意，要捞几千几万，这合理吗？”工人们想：是啊，老钱讲的全都是事实，他讲的全是咱们心里话啊！

一到晚上，老钱就到宿舍里经常对工人说：“为啥多数人作牛马，少数人作威作福？”还讲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工人团结力量大”的道理，要大家团结起来，齐心协力跟老板斗。他还告诉大家，最近新四军在苏北打了几次大胜仗，消灭了很多日本鬼子。这些新四军是穷苦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老瞿和大家听了都感到心里豁亮了。对新四军既向往又羡慕。老钱所说的新四军战士的英勇形象，时时在脑海中出现。这些革命道理，在搪瓷工人中间传播开来，象星星之火落在干柴堆上，燃

起熊熊的革命烈火。

国民党反动派对老钱在工人中的活动非常注意，企图陷害他。为了保存党的力量，不久上级党组织就把老钱调出上海。老钱虽走了，但他所传播的革命道理和新四军的战斗故事，却深深地印在工人们的心坎里。

“要团结，要斗争，要揭露老板的丑恶嘴脸！”搪瓷工人在觉醒。

那年夏天的一个中午，烈日当空，骄阳似火。搪烧工场工人在“火焰山”中干活，光着身子，用块布往下身一围，头上扎一条湿毛巾，汗水象雨水般地从身上滚下来，每个人都象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这天又有五、六个工人昏倒在炉子旁。工人们忍不住了，午饭时，大家纠集在一起，去找老板，提出在大伏天里让搪烧工人轮流歇一两天，老板一听，对着工人大发雷霆：“想得倒好，啥人要歇，请回家去歇，我在局门路上要捉一百只狗困难，要招一百个工人还不便当！”老板的侮辱，把工人肺都气炸了，他们冲着老板说：

“你讲理不讲理？”

“理？我的话就是理。”老板伸出大拇指，指了指自己的鼻子，说完扬长而去。工人们气愤地说开了：

“老板不把咱们当人，咱们别干了。”

“咱们要团结起来与老板斗！”

“对！要斗争到底！”

工人们经过商量，决定先从车间的通风问题上向老板开刀。

“啪”地一声，一个工人气呼呼地拿起榔头在墙壁上敲掉了几块砖头。微微的凉风从墙洞里透了过来。工头闻讯，马

上把这事告诉老板，老板一跳八丈高：“是谁敲的？这还了得，无法无天了。”他急忙带着工头赶到搪烧工场，双手往腰里一掬，声嘶力竭地喝道：“是谁拆的砖头？快说！快说！”工人们看着老板猴子似的乱喊乱跳的丑态，大伙异口同声地回答：“不知道！”老板又叫狗腿子一个一个地逼问。大家还是坚定地回答：“不知道！”老板看到工人心齐不肯讲，就恶狠狠地对一个年纪较大的工人说：“这件事出在你班里，你怎么会不知道？”一个工人跨上一步，指着老板的鼻子，理直气壮地说：“你蹲在写字间里喝冰汽水，电风扇吹还嫌热，我们在这里卖命，要透一点风，喘一口气有什么不可以？”“要透风犯什么法！”

“我们工人不是人吗？”

工场顿时沸腾起来。老板恼羞成怒，对着这个工人嚷道：“你不说，就是你拆的，马上给我滚蛋！”

“开除他，我们也不做了。”人群中喊出了一句。

“对，我们都不干了。”

大伙纷纷把搪钳一甩，向工场外涌去。瞬时，工场里瑯粉、搪钳、面盆、撒得满地都是，空炉灶内烈火熊熊，这烈火好似工人们胸中的一股怒火，越烧越旺。

老瞿和几个工人一起，奔到各个工场边跑边喊：“老板无理开除人，大家不要做生活啦！”喊声震动了全厂，激荡着每个工人的心。

制坯工人怎能忘记，有的工人轧掉手指后，老板不但不给医，反把人一脚踢出了厂门；有的工人象阿荣那样由于没有防护设备，而惨死在机器上……

喷花工人怎能忘得了，多少人没日没夜地干，累倒在面盆堆旁；多少人得了矽肺无钱医疗而含愤死去……

正是“搪烧工人热煞，汗流不断；制坯工人痛煞，血流不完；喷花工人呛煞，灰吸不尽；董老板笑煞，钱捞不光。”这多少年的仇，多少年的恨，象打开闸门的水，奔腾而出。

制坯工人停下了机器，喷花工人关掉了马达开关，搪烧工人干脆把炉栅也抽掉了，炉膛里火红的煤层立即塌了下来，用水一冲，蒸气冲天，“火焰山”成了大蒸笼，全厂的生产顷刻之间就停了下来。

搪烧、喷花、制坯等工场的工人们汇合成一股洪流，拥到账房间，团团围住资本家，责问为什么无理开除工人。董老板在齐心协力团结起来的工人面前，惊慌失措，缩成一团，象只“煨灶猫”，直打抖索，但又强作镇静地说：“他破坏厂规，理应开除，你们为什么无故停工，聚众闹事？”

“什么厂规？这样大热天关住门，算啥厂规？”

“机器轧死人不管，算啥厂规？”

“矽尘满屋，气也透不过，没人问，算啥厂规？”

愤怒的责问声，震得账房间的门窗格格作响。老板色厉内荏地叫道：“我说的就是厂规，谁再取闹，同样开除！”老板的蛮横无理，激怒了大伙，工人们怒不可遏，积压的满腔怒火立即爆发出来！

“打！给他点厉害看看。”

工人们一拥而上，老瞿和几个师兄弟你一拳，我一脚，打得老板嗷嗷乱叫，抱头鼠窜，好不容易从人缝中钻了出来，象条丧家犬似的一溜烟跑了。工人们怒气未消，又在账房间里乒乒乓乓把写字台推翻，账簿、算盘、茶杯等抛得遍地都是，几个狗腿子早已跑得无影无踪。工人们从心里感到痛快，无不拍手叫好。他们看到工人团结的力量。体会到共同斗争的喜

悦。

老板挨打后，对工人又恨又怕，特别把掂烧工场的工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想方设法要进行报复。为了防止工人团结起来再与他斗，就派人勾结由地痞流氓组成的“保安团”，请来了“包打听”。让这些家伙背着枪在各个工场来回游荡，监视工人。

“哼，别看你们神气活现，总有一天，我们要把你们的枪夺过来，看你们还能神气多久。”工人们望着这些家伙，心里愤愤地说。

不久，老板又让狗腿子到各工场放风。说什么：“现在东洋人打仗，厂里生意不好，要裁减人员。”接着，又把那些带头闹事的工人一个一个地解雇了，其中就有老瞿。

工人被开除，心里非常气愤。但他们又不懂，为什么我们这次斗争胜利了，资本家还敢来欺侮我们？为什么我们工人一直要受苦受难？为什么资本家那样作威作福？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党了解这些工人的心情。派了一位同志经常召集他们在一起谈心。这位同志的话是那么地中听，就象磁石般地吸引着工人们的心。大家常常围着他听到深夜。从他的谈话中，工人们才明白，老板作威作福，工人受苦受难，归根到底就是政权不在我们劳动人民的手里。只有彻底推翻旧制度，赶走日本鬼子，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劳动人民才有真正的胜利。

他们个个捏紧了拳头，表示了要砸烂旧制度，赶走日本侵略者的决心。

“是啊！不把这吃人的社会兜底翻过来，我们工人就没有

活路！”

“工人要解放，只有拿起枪！”

一天，党派来的同志，告诉了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了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上海人民最近要输送一大批工人去苏北参加新四军。”

“参加新四军，真的？”工人们高兴得叫了起来，他们一把抓住那位同志的手，抢着说：“我去！”“我也去！”那个同志霍地站了起来，用坚定深沉的目光看了大家一眼。激动地说：“好，去参加新四军，毛主席共产党指引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我们工人阶级唯一的解放道路。新四军就是我们工农自己的队伍。”

大家越谈越有劲，接着又商量着如何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一直谈到深夜，每个人的心中都是热呼呼的，恨不得一下子飞到苏北根据地，加入新四军的战斗行列，举枪挥刀杀豺狼。

那是在八月的一个早晨，老瞿等十几位工人踏上了参军的征途。工人们送了一阵又一阵，不断叮嘱着：

“放心去吧！我们一定紧紧团结，同老板斗到底！”

“盼着你们早日解放上海！”

亲人的叮嘱给了他们无穷的力量。阶级仇，民族恨，燃烧在胸膛。

“滴滴……达达……”响亮雄壮的集合军号声打断了工人们的回溯。老瞿亲切地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跨上军马，随着大部队，继续向前挺进！